



邓小平理论

诞生前的酝酿

尹书博 张明军 赵士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

第一章解放半个中国

一、矢志不移寻求真理

1. 救亡图存，路在何方？

四川，乃天府之国。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自古以来，在四川这块大地上，孕育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世纪伟人邓小平就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生。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继母夏伯恨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邓小平是邓家的长子，他的出世给邓家带来了欢乐和喜庆。

按照家族的辈分，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邓先圣。邓小平5岁就开始进私塾发蒙，私塾老师认为邓先圣这个名字不太好，就为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邓小平7岁时转入新式小学读书，11岁考入广安县的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广安县中学。邓小平自幼资质聪明，勤奋好学，受到父母和老师的喜爱。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期正处在中国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中国一次次战败，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中国成为任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中国人民备受欺凌和屈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是不甘被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同侵略者展开了拼死的斗争，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到义和团运动的狂飚，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斗争的鲜血和生命却在告诫着侵略者：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亡国灭种的处境刺激着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忧心如焚，他们在艰难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为希望通过改良，使中国走向富强，但是他发动的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消失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打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开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波及到了闭塞的四川广安。有些事件在年幼的邓小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乡这个偏僻的小镇。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邓小平所在的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四川人民的这场斗争在邓小平的幼小心灵中种下了民主革命精神的种子。

1912年，也就是邓小平8岁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不久，革命的果实就被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倒退，帝制自为，很快在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悲惨年代。国内，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加上天灾助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灭亡中国。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何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中国先进的青年知

识分子在思考、在探索。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5月底，五四运动的浪涛拍打到了广安这个偏远的县城。广安中学学生积极响应，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邓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邓小平的爱国思想更加浓烈。

“五四运动的发展及其后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中国革命及革命家的道路”。在五四运动中受民主、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

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门科学知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

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与各列强争雄的富强国家。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促使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9年9月，邓小平考入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节俭费用，推广西学”。这正与邓小平“工业救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相契合。他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学习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在预备学校，

邓小平精力充沛，学习刻苦勤奋。经过一年的学习，1920年7月中旬，邓小平顺利地通过了各种考试，成为80多名合格者中年龄最小的一员。1920年8月28日，80多名川东子弟乘坐“吉庆”轮，沿长江东下，9月11日，他们在上海换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船，向着目的地——法兰西驶去。

别了，故乡。别了，祖国。

年仅16岁的邓小平别故国，赴异域，从此走上了探索人生，寻求真理的道路。

2. 留学法国的油印博士

经过39天的长途航行，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邮船抵达马赛港。邓小平一行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紧接着，邓小平和同伴们到了巴黎，正式开始勤工俭学的生活。

邓小平到法国后遭遇的实际情况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他只在巴那学校和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经济危机。法国经济萧条，许多工厂相继全部或部分破产，工人失业，物价昂贵。法国人尚难就业，在法国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了。并且中国人的工资最多只有普通法国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做学不到技艺的苦工。求生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去求学了。

为了维持生计，邓小平曾先后在克鲁梭钢铁厂、巴黎的香布朗工厂、哈金森工厂等地做工，在这期间，他也曾做过饭馆招待、火车司炉、码头搬运工，以及清洁工等等。劳动锻炼了邓小平的身体，磨练了他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邓小平被一种新思想——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吸引。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广为流行。邓小平在较为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决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

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其宗旨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刊物实行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负责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乐观向上，充满了革命激情。邓小平负责刻板和油印，因为字迹清晰隽秀，装订简雅，同志们亲切地称赞他为“油印博士”。邓小平除了参加编辑、刻板、油印等工作外，还亲自撰写文章，号召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文章尖锐泼辣，充满战斗性，显示了邓小平飞扬的文采和革命者的豪情。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这年，他年仅20岁。1925年春，邓小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担任党团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同年夏，为了支援国内的五卅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旅欧支部组织旅欧的华人、华工、留学生进行了游行斗争。此事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中国共产党人。中共旅欧支部受到重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回到巴黎，主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5年8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组成了由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的书记局。这说明，在法国当局的镇压下，旅欧中共和青年团组织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迅速地恢复了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1926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离开生活战斗过5年多的法国，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社会主义革命的圣地——苏联。在莫斯科，邓小平先后进入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学习。这就为邓小平回国进行革命斗争以至对他在漫长的未来斗争中经受考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血与火的考验

1. 暴动百色

1927年春，邓小平奉命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

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的第一个场所，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在军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小平离开古城西安，前往汉口。邓小平被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数月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同时希望与共产党合作。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中央决定派人去广西，与李、俞配合，准备武装起义。

派谁去合适呢？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派邓小平同志去！”周恩来在留法时期与邓小平就有密切的合作，他深谙邓小平工作出色，遇事机智果断，是最为恰当的人选。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1929年7月初到达广西南宁。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迅速同李明瑞、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着手发展革命力量。一方面，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势力。邓小平通过渠道建议李明瑞建立了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军官。我党在教导总队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如四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张云逸，五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俞作豫。共产党人还注意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吸收农民运动分子充实部队。这就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我党领导下，大力发展了地方革命势力。在我党影响下，俞作柏开放了广西的进步群众运动，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在左右江地区有20多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广西变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好像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

广西局势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谋划着要扑灭这股正在燃起的革命火焰。正在这时，俞作柏和李明瑞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倒蒋战争。而一代枭雄蒋介石利用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手段，使李明瑞的亲信内部分化，战场倒戈，不到10天，倒蒋斗争就告失败。邓小平当机立断，把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决定以百色、龙州为重点，重新开创新局面。

1929年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胜利会合。百色是距南宁约150公里的城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桂、滇、黔三省的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百色，就等于控制了广西西部。

一到百色，邓小平和张云逸就立即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建立政治制度等；其次，培训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武装农民，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

1929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二周年的纪念日，百色武装起义的枪声

打响了，鲜艳的革命旗帜在百色的上空飘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按照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权。

1930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权，他兼任红八军政委，根据中共中央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他们在左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使红军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及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2. “罗明路线”的代理人

1931年夏，邓小平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到任后，迅速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1932年冬，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1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更加直接的领导。顿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左”风盛行。

对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和极“左”做法，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坚持此时已靠边站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却受到临时中央的批判和斗争，罗明也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同时，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力量都要发展；反对极“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为此，临时中央组织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文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斗争。

5月5日，斗争进一步升级。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且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讨，不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邓小平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错误地解除领导职务。

到边远的地区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但是到乐安县南村区不到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返回宁都。据说乐安县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随即指定在离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留法时期就与邓小平有过密切交往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邓小平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并把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做了汇报。王稼祥对邓小平是了解的。他认为在根据地战斗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的情况下，把邓小平这样重要的富有才华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等于浪费人才。于是他建议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争取下，临时中央同意了这项建议。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编报对邓小平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他在留学法国期间就有了编辑《少年》、《赤光》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在战事频繁的艰苦条件下，带领两名助手努力工作，使《红星》报一期一期地出版，从未间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

3. 长征途中王明

“左”倾路线的推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一个永载史册的壮举——长征，开始了。

中央机关长征时分成两路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等负责同志都在这个纵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邓小平随总政治部机关一道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抢渡湘江时，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处境异常危险。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将自投罗网，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

逃跑主义只会葬送红军，葬送革命事业！残酷的现实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大家都急切地要求改变错误的领导。人心的天平渐渐地向毛泽东倾斜。毛泽东被排斥在领导之外的状况开始转变。许多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日益扩大。

毛泽东向贵州挺进的建议，迅速地改变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攻下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多数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言，但毫无疑问，他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出危机，迈向光明。

红军长征异常困难，作战一线更加艰苦。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念，必须加强宣传工作。这样，精明强干的邓小平在1935年6、7月间，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中

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个全新的革命局面正在到来。

1936年2月，邓小平又随军东征。东征结束，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三、纵横华北

1. 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从而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战爆发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红军改编后，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邓小平与刘伯承从此一起工作，一个政治主管，一个军事主管，共同度过了13年的戎马生涯。两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作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太行山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刘邓率领一二九师经过一系列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又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证。站稳脚跟后，刘邓又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又相继创建了冀南、大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邓小平赴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地方工作经验的发言。12月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根据会议精神，他同刘伯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率领一二九师活跃在敌后，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

1939年8月，邓小平再次去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期间，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卓琳。8月，他同卓琳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不久，返回太行山。

此时，根据地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地除了要打击日寇大规模地清剿、“扫荡”外，还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顽固派的挑衅、进犯，邓小平和刘伯承作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在刘邓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先后取得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等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1940年8月起，刘邓所部又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从1941年开始，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巩固了根据地。

为度过难关，对付新的局势，1942年，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二九师采取两项新的举措。

一是精兵简政。刘邓首长亲自抓，使精兵简政迅速见到成效，部队“身体小了”，但更灵活机动，增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实，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晋冀鲁豫的精兵简政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

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经济生产，既改善了军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克服了敌人封锁的困难。

最为艰苦困难的 1941 年和 1942 年，终于过去了。

2. 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

1943 年春天的来临，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了即将胜利的佳讯。

1943 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1943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跨出困境，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一年。

1943 年，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此前，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中央决定，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把主持北方局、主持晋冀鲁豫全面工作的重担交给邓小平，说明党中央对他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的双重信任。10 月 9 日、刘伯承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从这时起，邓小平在太行山全面负责领导党政军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担。1943 年 12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局委员会会议，讨论和确定了 1944 年的工作方针：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1944 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同时主动向敌人发动春夏攻势和秋冬攻势，到年底共歼敌 76000 余人，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

邓小平在彭德怀、刘伯承及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赴延安学习的情况下，在主持华北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中，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领导全区人民，粉碎敌伪“扫荡”，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开展整风、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军事上、政治上、生产建设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1945 年 4 月至 6 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邓小平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没有参加七大。但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

在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例如：1943 年 1 月，他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削弱敌人，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又如，1943 年 7 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作了阐述，再如，同年 11 月，《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从这些文章中，充分显示出邓小平作为革命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领导才能。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千里跃进大别山

抗战胜利后，人民迎来的并不是和平，国民党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加紧备战，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国民党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小平和司令员刘伯承，共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对停战协议的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战爆发后，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路南北开展运动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9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1947年6月，在共产党兵力仍弱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由刘邓率大军挥师南下，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挺进大别山。由此，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夜之间突破了蒋介石号称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然防线，揭开了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

突破黄河防线后，刘邓部队经过20多天的战斗，在鲁西南歼灭敌人5.6万人，受到中央的通令嘉奖。接着，他们疾速南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像一把利刃刺入蒋介石的心脏，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蒋介石调动20万人的主力围困大别山，欲趁刘邓大军站脚未稳之际，就地消灭，或将其赶出大别山。当时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十分艰难：连续行军打仗，极度疲劳，缺乏在南方作战的经验，粮食、服装、弹药奇缺，群众有待发动。为此，刘邓决定分兵作战，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则留在大别山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邓小平激励将士说：我们在大别山背上的敌人多些，吸引了蒋介石的兵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邓小平同战士们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轮番“进剿”，并创立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洞相继南下的陈粟、陈谢两路大军一起，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为中共中央逐鹿中原的战略布置奠定了基础。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辖区扩大了的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从中原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新解放区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具体政策。他为中原局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报送中央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转发这个文件时，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1948年9月，邓小平参加了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西柏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号召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夺取全国胜利。

西柏坡会议预示着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进入了大决战阶段。

2. 大决战的岁月

1948年秋开始，国共两党在中国北方地区展开了战略大决战。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我军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11月，三大战役的第二战，淮海战役打响了。淮海战场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到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其中心是徐州。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大门。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为了统一南线我军的行动，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总前委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领导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拥有兵力80万人，大大超过了人民解放军参战的中野和华野60万人的总人数，在武器装备上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决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了正确的部署。总前委决定采取将敌军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办法。

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洋：张克侠率领两个军起义。华东野战军迅速切断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将其包围在碾庄地区。中原野战军立即转入徐蚌作战，占领战略要地宿县，形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随后，经过11天的苦战，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深入的黄维兵团。中央同意总前委的部署、并指示在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副美式装备，拥有兵力12万人。黄维乃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甚是骄蛮。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攻时，蒋介石令黄维北进驰援。总前委决定投入12万人的兵力，对黄维实施包围。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双堆集地区，并将其全部歼灭。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杜幸明集团，活捉徐州“剿匪”司令部副司令官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这样，经过66天的战斗，以歼敌55.5万的战果，宣告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至此，国民党南线的全部精锐主力被彻底消灭，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领土，南京门户洞开，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全面胜利的局面。

60万对80万，淮海战役是一次以少胜多的重大战役。当时斯大林听说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斯大林还曾让尤金到中国学习和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对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进行了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版，第3卷，27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版，（上卷），61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扬。甚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对此还念念不忘，他对刘、陈、邓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漫漫长江上，万船齐放，万炮齐鸣，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被蒋介石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最终覆灭。

3. 向大西南进军

1949年9月21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刘伯承、陈毅等开国元勋们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盛大的开国庆典。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央要求发扬勇追穷寇、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根据中央部署，第二野战军直攻云南、贵州、四川，解放大西南。同时，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开始向大西南进军。11月1日，刘邓指挥二野发起川黔战斗，11月21日攻克贵阳市并切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11月24日，二野又一举歼灭宋希濂集团及刘广文兵团3万余人。11月30日，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解放。蒋介石又命令其部队撤至成都地区。刘邓决定将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消灭在成都盆地。12月20日，刘邓指挥二野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迅速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状包围。12月21日，二野各兵团发起了成都战役。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抛下他那已陷于绝望境地的众兵将，坐飞机只身逃往台湾。随后，二野陈赓兵团在四川西昌地区歼敌1万人，致使残存于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正规部队全部肃清。与此同时，在云南的滇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解放。

在大西南，只剩最后一个地区——西藏没有解放。所以，在云、贵、川解放后，进军西藏的任务又落在了刘邓大军的肩上。

1950年，毛泽东授命刘邓大军，担负起进军西藏的任务。

刘邓决定把进藏的任务交给二野五兵团第十八军。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刘邓专门召集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进藏部队勇敢地担当起这一光荣任务。邓小平特别强调，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有特殊性，工作政策性很强，我们要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要靠政策走路，要靠政策吃饭。

1950年10月，我军向西藏东大门昌都发起进攻，歼灭藏军5700多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5月25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政府代表团通过谈判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部队学习藏语。

1951年8月至9月，第十八军踏着千年积雪，冒着严寒，向着空气稀薄

的世界屋脊西藏进军。9月，进藏的先遣部队进抵拉萨，受到当地藏族、汉族、回族等各界代表3万多人的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十八军指挥机关率部进驻拉萨，其余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上高高飘扬，粉碎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分裂企图。

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刘邓大军圆满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光荣任务。

第二章从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中央总书记

一、坐镇西南

1. 剿匪反霸，稳定社会大西南

解放后，邓小平未及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大西南的工作之中。

在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消灭后，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国民党训练的所谓游击干部和有计划潜伏下来的武装力量，及有些已投诚的部队、又乘机叛乱，继续进行所谓的“游击战争”，与人民为敌，还有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等，不甘心灭亡，伺机破坏工厂和交通，抢劫粮食和物资，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

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少数同志却开始滋长居功享乐思想。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无事可干了，应该享受胜利后应有的优裕生活了”。

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他的提问使所有到会者的责任感凝聚了。接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有90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6000万基层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在谈到剿匪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军队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工作队，在当前的形势下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清剿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

1949年12月29日，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发出1950年工作指示，要求迅速完成扫清残敌全部解放西南的任务，并进而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各级都成立了剿匪委员会，以野战步兵团为主担任剿匪任务，以地方武装为主担任守备任务。在实施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遵照刘邓关于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匪属，分化瓦解匪众，迫使一些首匪先后缴械投降。

广大群众看到解放军是真正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他们也真诚地拥护军队、支援军队，积极配合剿匪。在刘邓的正确领导下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到1950年10月基本清除了川、黔、滇、康4省境内的匪患，共歼敌85万余人，重要匪首基本落网。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大力建设地方武装。邓小平指出，我们确定除正规兵团注意按编制充实名额外。立即开始扩大地方武装，巩固后方秩序。同时还制定了建设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方针及发展民兵的具体步骤。经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斗争，群众觉悟迅速提高，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积极性，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建立了10余万人组成的地方武装和由80余万人组成的人民自卫队，建立了以贫雇农力基础的农村政权，为顺利进行土改创造了条件。

在政权巩固和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以后，从1951年春开始，在西南分三批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对土改运动，邓小平进行具体指导。在西南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为了使土改不出偏差，应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典型

试验（每个地委搞一两个县）；第二步在平地进行；第三步在山地进行。他提出不同地区的土改，应分批进行。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西南地区顺利地完成了土改，使广大贫雇农真正翻了身，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认为这是事关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一环。他在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强调，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经济方面着手。他指出，物价稳定，人民才安定，对共产党才有信仰。只有物价稳定，才能团结群众。所以，邓小平倾注大量精力，努力保持西南地区的物价平稳。从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社会。

2. 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

西南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民族问题显得十分严峻和突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贯穿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大西南的民族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使西南民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实践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建民族关系的主张和见解，丰富了我党的民族理论宝库。

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加上历史上的反动统治有意制造民族矛盾，造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要保持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进军大西南之前，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就把民族问题作为解放和建设西南的一个重要问题。1949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二野前委扩大会议上，除了研究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外，还专门研究了少数民族工作。并且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民族政策教育，作为进军西南的思想政治准备。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始终把民族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而要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首先要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虽然消除民族隔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消除民族隔阂，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邓小平还指出，要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就必须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其中主要的首先要反的是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从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社会的各项改革，党的各方面的政策，都必须紧密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有关改革的事情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要征求少数民族头人的意见。由于坚持了这样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出了一系列受少数民族拥护的具体政策。例如当年贵州的一些苗族人就迫切要求实行减租和土改，原因是这部分苗族人种的是汉族地主的土地，受汉族地主的剥削。因此，西南局特地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入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

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就要防止把汉族地区实行的政策简单地照搬到

少数民族地区去。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在具备了土改条件后，但是也没有采取汉族地区所实行的主要通过强力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即内部和平协商、赎买以及自上和自下相结合的方式，一切有关土改的问题都与少数民族头人及愿意土改的人士共同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然后才去实施。实行和平土改，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团结最大多数群众；有利于争取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宗教纠纷。所以，这种方针政策和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邓小平在西南民族工作中，十分注重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一贯要求，凡是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都要同本民族的人民和干部充分商讨；最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办。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在大西南解放后，就积极推行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0年6月25日，他在为西南局起草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必须坚决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并具体指示：“在康定地区必须坚决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愈快愈有利。”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要实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关键的在于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对此，邓小平一贯重视。他指出，要立足于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开展工作，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应由本民族人士担任，并且真正行使权力；搞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在于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

3.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革命胜利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革命队伍里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有不少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党掌握政权了，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了；也有同志认为，在执政条件下，即使不搞统战，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也会自动地汇集到党和工农群众周围等等。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西南召开的第一次统战工作会上，邓小平深刻地阐明了统战工作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因此，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邓小平要求每个党员都应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深知，西南的封建势力比其他地区都大，因此反对封建，要有步骤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与我们一道工作。刚进城不久，邓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由统战部召集一次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并发请柬，请重庆市各界名流吃饭，向大家请教。

邓小平强调，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广泛吸收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参加。到1950年9月，大多数县、市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许多地方还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通过这

《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同上，155页。

些会议，宣传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推动了各项工作，对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给予多方面的照顾。妥善安置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职位，承认这些将领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对各级政府中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负责人士，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尊重他们，遇事同他们协商。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减租、退押、土改运动，使他们了解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让他们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中，在牵涉到民主人士时，邓小平指示，对他们的处理，必须事先请示，不得违反。

由于正确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敌人，促进了大西南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4. 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廉政、勤政，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他一切为民着想，努力发展生产，殚精竭虑解决关系人民疾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西南是受烟毒危害最大的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下，鸦片种植面积之大，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指挥禁绝烟毒，由于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宣传得力，在短时间内，禁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为了解决大西南交通闭塞，交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的组织和大力支持下，修筑从拉萨到青海的青藏公路和修筑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实现了四川人民多年的愿望。青藏公路，不久之后也建成通车。

邓小平开创性的工作，很快改变了西南贫困、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的工作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1951年1月，毛泽东称西南的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很大。”5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中央的关于西南工作的综合报告上写道，“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并批转各地。

1951年春，梁漱溟根据毛泽东“到南方去看看土改”的建议，随章乃器领导的土改分团到了四川。他在重庆听了邓小平对四川情况的报告和分团会议上的讲话，深感邓小平年轻有力，精明能干。口到北京后，梁漱溟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把一个混乱的四川，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实现了稳定，实乃出乎人的意料。这一局面的取得，首推刘邓治川有方。特别是邓小平，精明能干，有才华，年纪轻轻，深得人心。梁漱溟还为邓小平正确地处理四川袍哥问题而赞叹不已。他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散布范围很宽，影响很大，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分化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便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此举实在高明！”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梁先生看得蛮清，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言谈之中透露出一代杰出领袖毛泽东对邓小平才华的欣赏和他工作的赞扬。

《邓小平谈邓小平》，1版，33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千秋功过》，1版，85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

二、中央领导核心的新成员

1. 政务院副总理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

民主改革任务完成、经济恢复之后，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上级就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是这对当年曾经在上海和巴黎共同战斗过的伙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不久，邓小平成了政务院发言人，并很快登上了国际舞。1953年8月，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总理抓财政工作。根据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三句话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根据这6条方针，邓小平于1954年6月向中央人民政府作了《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收支相抵，并且结余16.5亿元，日子过得不错，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杰出的理财能力。

在此期间，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邓小平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参与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选举法的起草工作；他还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在实践中，邓小平卓越的管理才能和远见卓识进一步得以实现并获得国内外承认。

2. 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

继邓小平之后，东北和华东的党政最高负责人高岗、饶漱石也先后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高岗进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高岗一直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而心怀不满。

当中央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

1953年夏，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布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的刘少奇和周恩来。贬低别人，借以抬高自己，损害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明显表明高岗反党意图的是他散布的“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本人则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他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所谓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1953年12月，毛泽东要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高岗出来反对。高岗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

对于高岗的阴谋活动，饶漱石进行紧密配合。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正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

饶漱石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他们彼此呼应，配合默契。

高岗一方面散布谣言，进行挑拨活动，煽起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对高级干部进行拉拢，企图为我所用。

当时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西南局的领导职务，同时，在第二野战军中他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并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和器重。因此，邓小平也成了高岗拉拢的目标。但是却遭到了邓小平的断然拒绝。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曾回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也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同样遭到了陈云的拒绝。

邓小平和陈云立即把高岗的阴谋活动向毛泽东作了反映。

毛泽东在听过邓小平反映后问：“山雨欲来，风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方呢？”

邓小平回答说：“在其位谋其政，应本分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利欲作怪呵！”

邓小平的话提醒毛泽东，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的危险权力欲的存在，将永无宁日。

对于高、饶阴谋活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中，毛泽东就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做了警告。但是高岗无视毛泽东的告诫，变本加利地进行活动。僥倖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的揭发，毛泽东对高、饶的阴谋活动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但是高岗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版，（上卷），317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世界上有55个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驻苏大使）为成员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24日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直至25日东方即白时止。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也没有邀请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报告结束后，苏共立即把报告的速记稿送到了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朱德受苏方邀请继续在苏联访问，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邓小平和师哲一起乘飞机回国。回国后，邓小平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该文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最后审定的。

文章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斯大林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既指出了由于骄傲而产生的主观主义、片面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认识问题；也指出了客观原因。即个人迷信有着很大的群众基础。另外，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集中。

文章最后指出，中共要健全集体领导和采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以防止产生个人迷信。我们应从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4. 中共八大的报告人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成为大会的主角之一。

在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提出了团结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伟大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突出个人，加强集体领导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除了过去党章中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同时，新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毛泽东认为摆脱第一线繁忙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仍

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指定“接班人”制，阻止“家长制”，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共八大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总书记。成为6位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员，这年他刚刚52岁。

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标志，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三、艰苦的探索

1. 器重的“副帅”

从1956年到196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直活跃在工作第一线，他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作为副总理，他分担了许多政府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年轻体健、精力充沛、才华卓越，加上辩证的思维方法，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工作起来效率很高，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向赫鲁晓夫介绍邓小平说：你看到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谈他的接班人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即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50年代末，毛泽东曾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

从毛泽东的一次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欣赏和期望。

在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出现过曲折。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重视关心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等。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灾难。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措施，制定正确的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1962年2月，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1962年7月，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恢复农业生产，大胆地提出生产关系采取哪一种形式，要看哪一种形式能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为群众所自愿接受。

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2. 探索中两种趋向的产生和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及历史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一些做法。但是到了“一五”计划的后期，前苏联经验的弊端开始表现出来。恰在这时，苏共“二十大”也揭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再加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苏联经验和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毛泽东当时指出，苏联走的弯路，难道你也走？他指出，要“以苏为戒”，要“破除迷信”，要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1956年开始，我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任何道路都不是笔直和平坦的，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从 1956 年至 1966 年 10 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种趋向以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为发端，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又进行了 9 个月的探索，1960 年冬天以后又进行了 5 年的经济调整。在断断续续的探索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原则，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等。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政策。主要表现力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在 10 年探索中，正确的趋向和错误的趋向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存于党和人民的探索进程之中，共存于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两种趋向在发展过程中，有时正确趋向占上风，有时错误趋向占上风。但是，10 年中错误趋向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最后终于暂时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更加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如此，正确的发展趋向也没有停止，10 年中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因此，从总的方面看，从长远来看，正确的趋向最终仍然战胜了错误的趋向。10 年探索中积累起来的好东西、好的经验，后来被邓小平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10 年探索中，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好的经验的取得，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成果。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一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在实际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3. 要从“五定”着手整顿企业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也给工业企业管理带来严重的混乱。企业党组织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许多企业技术、管理科室撤了，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使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企业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浪费惊人；在分配中，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还有些企业推行“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搞所谓“八自”、“十八无”。有些企业把所有的规章制度看作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以致出现所谓“十大随便”（上班

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由于乱破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混乱，因此生产事故时有发生。1959年的前几个月，工业交通部门因事故死亡3万多人。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邓小平在“大跃进”不久，就已察觉，并且发表了切中时弊的见解，“工矿企业，在生产方面，同样还要提出加强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责任制。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有的废除后要重建，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特别是大生产里边一系列的问题，就更要有充分的科学的根据，随便乱动不得。大生产应该着眼于搞技术革命，不是搞人海战术。”

1961年6、7月间，邓小平到东北调查，了解工矿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的途径。7月15日，邓小平在辽宁听取汇报时指出：“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解决企业问题，要从几定人手……”7月25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企业如何搞法，看来还是要搞几定。几走后，再着重搞品种质量，踏踏实实搞几年。

为了系统总结我党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8月11日到14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开会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讨论修改后，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这一文件。在转发批语中，中共中央说明了在企业中进行“五定”的意义：“‘五定’是摸清和核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是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五定’就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1961年9月15日，中央又下发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就加强工业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等作了8项规定。其中第6项强调：“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从‘五定’入手，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每个企业“五定”之后，不能任意变动。

1961年9月15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整顿企业要从‘五定’入手。应该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抓。”“经过‘五定’，要把经济核算搞好，把责任制搞好，把协作关系恢复起来，协作关系不能打乱，使企业真正能独立经营，独立核算。”

4.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大跃进”时期，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生产上是“大呼隆”的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是“吃大锅饭”，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左”倾错误政策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给中国的农业带来严重破坏。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力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棉花、油料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1962年粮食供应紧张，灾情不断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在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安徽省宿县、全椒等地的农民自发地搞起

了“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些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很好，深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了争论，出现了不同意见。刘少奇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同意或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仍不统一。

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谈了他对“包产到户”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去年粮食比1957年减产800亿斤，其中40%是肥料问题。因为集体搞，个人积肥的积极性没有了，猪少了，鸡少了。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不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谈到“包产到户”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四川的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道理。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现在看来，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的来说，就是要退，实际上也是这样，退了才能前进。邓小平最后指出，要恢复农业生产，就要百家争鸣，要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却持有不同意见。在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毛泽东就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1962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还认为，“包产到户”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是地主富农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等具体生产形式的错误的批判，使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责任制废止，并长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导致了农业集体经济一再遭到严重的破坏。

5. 注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邓小平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他做了辛勤的探索，在理论上，他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的思想主张。他这时期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

第一，共产党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思想观点。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更要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因此，邓小平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

党执政以后，由于地位的变化，我们的党员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我们的领导干部，有一部分人可能经不起掌权的考验，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当官做老爷。执政党的地位，也使一些共产党员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对此如不注意，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

党执政以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党内产生着一种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作风。有的党员甚至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走向犯罪。另外，执政党的地位确实也驱使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千方百计混入党内，妄图利用党的执政地位，来捞取个人的好处。

党执政以后，党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面对新形势，许多同志不能及时转换角色，仍然拿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很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这就要求共产党人熟悉新形势，学习新本领。

针对执政党面临的以上新问题、新考验，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仍然是人民的工具的鲜明观点。他指出，执政党能否防止和克服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倾向，永远保持同人民的紧密联系，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二，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57年他就指出党委领导必须是抓大事，管方针政策，他还指出，要使党真正成为讨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机构。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即在于强调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应当是指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性的总的领导。就是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起指导、引导、向导的作用，保证人民群众能够运用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有效地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党不强制群众接受党的主张，而是强调用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来吸引群众，用自身的模范行动来感召群众；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把党政职能分开、不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要实现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做到充分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依靠和发挥共产党员的自觉性、创造性、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带动群众实现党的主张。

第三，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根据我党执政7年的实践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其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接受监督，是因为：

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代表人民群众来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这就需要通过人民群众以及党内的有效监督来保证执政党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否则，如果党不接受监督，那就注定要犯大错。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执政党接受监督，也可以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执政党有了群众监督，就能听到更多来自不同层次的群众的声音和要求，就能使各种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得到安排，各种利益矛盾就可以化解。

执政党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生活。执政党状况的好坏，又与监督作用发挥的如何直接相关。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犯了错误影响也就大。因此，要使国家生活正常科学地运转，必须对执政党实行监督。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看，执政党也必须要接受监督，以防止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蔓延和发展，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使领袖人物经常处于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要搞好执政党的监督，邓小平认为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即：实行党内监督、实行党外监督和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第四，执政党要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对于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视，他认为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党脱离群众，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性质。

对于加强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邓小平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如提出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在企业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党的干部制度实行改革，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干部能上能下，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等等。

6. 关心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

建国后，我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长期存在着“左”的错误，严重地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从 1961 年开始，党逐步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邓小平主持制定了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在教育、科学、文艺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的提拔和使用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邓小平指出了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失误，即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很多技术干部在工作中不能发挥自己、所长，严重浪费人才。因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大批提拔技术干部，特别是年轻的技术干部。“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在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对于技术干部的提拔，“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即坚持又“红”又“专”。

邓小平还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大胆选拔和使用，晋升职称不要受数额限制，只要够条件，要有多少，提多少，要经过精选、评议，专业技术水平一定要用专家来考核鉴定，技术干部成就突出的，也可以破格提拔，提拔工作要经常化，要经常帮助专业技术人员进修，给他们提供自学条件，要制定方案，进行授予学位的工作。

邓小平上述思想主张的贯彻实施，使我国 60 年代恢复了评定、晋升知识分子的专业技术职称的工作，开始了授予学位工作的试点。这对于提高知识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1 卷，29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同上，292 页。

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我国 60 年代的教育、科技、文艺等事业的复苏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7. 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

从 1959 年开始，在党内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不久，就提出学马列主义“不一定都要读他们的原著”，学毛著是学马列主义的捷经，可以“一本万利”。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康生也荒谬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针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 年，他鲜明地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邓小平对领袖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也作了精辟的阐述，指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邓小平针对林彪等人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而提出的上述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但没有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1 卷，284 页、2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1 卷，28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三章大动乱的年代

一、第二次被打倒

1. 风暴突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授意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相继召开，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担任副组长。以后，这个小组逐渐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发号施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很多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乱揪乱斗现象在一些学校尤其是高校出现，学校陷于混乱，党组织开始瘫痪，无法开展工作。

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万分忧虑，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状态，把运动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按照以往开展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在工作组派出不久，局势暂时平定的时候，由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暗中操纵，学生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事件，有的甚至把工作组赶出学校。为了维护工作组的权威，稳定局势，刘少奇、邓小平和在北京的中央常委表示了坚决支持工作组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中央文革小组此时却在利用党报党刊，公开煽动学生闹事。许多学校发生学生间两派或几派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

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说：“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大字报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准，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终于点明了从1966年初开

始，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其斗争的主要锋芒即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仅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一个职务。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保留了常委职务，但实际已经靠边站了，在全会期间及以后，他们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但是，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打桥牌也成了罪过。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实际上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并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的态度。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四处串连，到处炮打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从10月开始，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到1966年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密召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面授机宜。要造反派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打击，搞臭他们。

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5000人在北京各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谩骂。顿时，“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

蒯大富只是拉开了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的序幕，更进一步的迫害又陆续展开了。

1967年2月5日，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造反派”们在宣读《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二十大罪状”的同时，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罪状归纳为：

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批判个人崇拜，褻渎毛泽东的权威；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通过1961年的高教60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反对毛泽东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政策的批判；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等等。

除以上莫须有的罪名之外，造反派还散布流言蜚语，说邓小平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的策划下，造反派除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舆论批判外，更进一步地进行人身折磨和人格侮辱。1966年8月4日，江青、康生一伙乘毛泽东离京之机，组织了一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大会，分别在中南海内各家院里举行。

邓小平被围在院子里。在“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中，邓小平站在烈日下曝晒，汗流浹背。他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接受红卫兵的审问和批判。党的总书记，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就这样遭受着一批造反派的批判、折磨和凌辱。

随着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他的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在北大就读的子女邓朴方和邓楠被秘密抓走，关押起来。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审问，诱供、套供、逼供。对邓朴方，他们更是往死里整，邓朴方忍受不了造反派的非人折磨，愤而绝命。虽然没死幸存下来、但也成了终生残疾。

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林彪、江青等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被毛泽东否决。他说：“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

二、在江西的沉思

1. 被逐出京

在全面完成了夺权斗争，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悄悄揭幕。“九大”与“八大”整整相隔了13年。“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九大”创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特的记录，即把党的主席的接班人用法定的形式写入党章。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却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除了严重的内乱之外，中国还受到来自前苏联的军事威胁。前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在“九大”召开之前不久，中苏在珍宝岛交战。“九大”后不久，中苏又在新疆发生多次军事接触。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两国出现了严重的对峙局面。

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朱德、李富春被赶到了广东从化县；陈毅被赶到石家庄；叶剑英被逐到长沙；聂荣臻去了邯郸；刘少奇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开封；陶铸被送合肥。在这种形势下，被隔离两年之久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疏散转移到江西。

1969年10月，一架“专机”将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三人，送达南昌。邓小平动身之前，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到江西后的生活、安全等作了具体指示。开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计划把邓小平安排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赣州。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指示，一定要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并且对住房也作了详细安排。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江西省革委会对邓小平作了以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二层楼房，又称为“将军楼”。周恩来在危难之时对邓小平的保护，既出于深挚的友情，也出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考虑，也要尽力保护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保护，邓小平才得以保全，为他以后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了条件。

邓小平在“将军楼”一住就是3年，这3年是他思考的3年，是他对革命信念更坚定的3年，也是他与世隔绝饱受孤独的3年。

2. 邓小平

小道“将军楼”离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约莫2公里多的路程，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卓琳步行去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重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钳工旧业，他干得一丝不苟，干得得心应手。他的妻子分配做拆洗马达线圈的工作。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心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开始与他建立了友谊。在劳动中、在生活上，工人们处处以工人特有的质朴感情来关心照顾这位年愈花甲的老人。工人们忘记了邓小平此时的身份，也忘记了邓小平以往的地位，都亲切地呼他“老邓”或“老头”。从“将军楼”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每天邓小平夫妇

去厂里劳动半天，下午，在他们开垦的菜地上，种上胡豆、白菜、辣椒、丝瓜、苦瓜等各种蔬菜。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菜园里郁郁葱葱、果实累累。邓小平当时 65 岁，在一家 3 人之中，他可谓是壮劳力，所以诸如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都由他来干。他的妻子患有高血压，时常还需要他照顾。年事已高的邓小平的继母，每天要为 3 人操劳做饭。

邓小平获准把自己在北京的藏书带来，所以在劳动之余，他就抓紧时间读书。除了读大量马、列著作外，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的生活极有规律，早晨，到工厂劳动，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每天夜晚就寝前，他总要围着院子步行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坚定快速、他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他在心中思考着，谋划着——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做着今后战斗的准备。

每天，邓小平都围着院子散步，不管数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从不间断。天长日久，院子里的草地被踩出一条小路。后人把这条小路称做“第二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蒙难之际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而苦苦思索的见证。

三、“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破产

1.“九一三”事件

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接班人”之后，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为了篡夺更高的领导权力，积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及其党羽为了林彪能够当上国家主席，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抢先发表讲话，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的党羽在会上积极呼应。从中毛泽东察觉到了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宣布对陈伯达实行隔离审查，责令林彪的几个主要党羽在会上检讨，并对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

党中央、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眼见形势不利，林彪一伙决心挺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1971年3月，林彪的儿子组建的“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揭露林彪的阴谋活动。林彪从亲信处获知情况后，9月8日，林彪批准了林立果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行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并采取了机警的行动，安全回到北京，使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的行动破产。

林彪在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引起全国人民的震动。震惊之余，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出林彪集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走资派”，搞个人崇拜，究竟对不对？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中国究竟有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被林彪所反对、打倒的那些人，是否属于冤案？“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广大群众从日常生活中切身地感受到：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前好。“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2.“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按照中央规定，此通知第一步下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传达。

1971年11月5日，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去参加工厂召开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不过，凭多年的政治经验，邓小平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建国后每年例行的

国庆天安门广场游行活动取消了，而且作为“副统帅”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从中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在工厂，邓小平整整听了两个半小时的文件传达。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中央文件和林彪、陈伯达罪行材料，自始至终，他没有离开一下座位，一直端坐着，没说一句话。

尽管在听文件传达时，邓小平没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回到家后，当监护人员不在、女儿问起有关情况的时候，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当晚，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一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接着，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 4000 多字的信，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最后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

信发出后，邓小平在静候着毛泽东的回音。他坚信，随着林彪的灭亡，国家的形势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四、1973年的春天

1. 毛泽东的批示

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林彪垮台后，毛泽东也希望国家能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尽管从全局上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作了调整。此时，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抓紧“九一三”事件后的有利时机，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解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做了重新评价。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按：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

作为“二月逆流”成员之一的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在追悼会前，毛泽东对陈毅的妻子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心中十分欣慰，因为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当即暗示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制造舆论。

同在江西劳动改造的王震，1972年利用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地向中央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启用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信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毛泽东看信后，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毛泽东情不能已，挥笔写道：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使邓小平的处境得到迅速改变，同时，邓小平的命运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在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立即决定：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版，344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版，（1966—1976），293页~2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进行讨论。为了改变邓小平的处境，周恩来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起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同时决定，将邓小平以前的秘书（在“文革”中受尽磨难、此时正在干校劳动）王瑞林，派到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

1972年秋，贬居江西新建县的邓小平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让他到江西革命老区参观并顺便考察泰和县的农业机械化。在井冈山，邓小平漫步流连，遥想当年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在八角楼，当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此时仍然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紧箍咒的邓小平，不再沉默，他插话说：“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了完成总理交给的考察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替总理分忧，邓小平还对泰和县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岗、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邓小平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因为回京工作已成定局，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久，邓小平急于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12月5日，邓小平又匆匆上路了。他又重新踏上长征以后再也回去过的阔别38年的那片红土地。走兴国，访于都，8日，到达会昌。1932年邓小平曾在此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合而为一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这里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蒙难之地。邓小平在多年之后，第二次蒙难之际重访故地，心中一定有许多感慨，但是他没向当地同志吐露这段辛酸往事，而是把它埋在心底。同日，邓小平又到了中央根据地的红都瑞金。江西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邓小平给予了热情招待，尽管当时他还戴着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瑞金县的同志深情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是啊，老区人民没有忘记他们40年前的这位老县委书记，没有忘记这位曾为他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老区人民这句简单而富有感情的话使邓小平感动不已。随后，邓小平又走访了宁都和广昌。12月15日，他结束了这次为时10天的赣南之行，把他几十年来对赣南老区人民的思念洒播在当年战斗、工作过的红土地上。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前的老区之行，为他不久之后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提供了动力，也使他了解了当时中国工农业的基本情况。

2. 国宴上的政治明星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告别了生活了3年多的江西，回到北京，住进了景山后街一座小院里。

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江青一伙举手赞成邓小平复出，于心不甘，但是要他们直接站出来反对启用邓小平，他们又不敢，因为如果这样做，不仅是和周恩来等对立，而且可以说是反对毛泽东了。所以他们权衡再三，只能暂时妥协、让步，同意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同日，中央做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9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周恩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是在 1973 年 4 月 12 日中国领导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盛大宴会上，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轰动，敏感的外国记者匆匆忙忙把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到外界，这件事立刻传遍全世界，成为一条重要新闻。邓小平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注目。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他（指邓小平）独自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雪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 7 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在恢复组织生活 5 个月后，邓小平在 1973 年 8 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从此，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197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几天，毛泽东在同与会部分人员谈话中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1974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却竭力反对。毛泽东得知情况后，3 月 27 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指出：“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974 年 4 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率团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五、临危受命

1. 纠“左”受挫，国势日危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社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此后，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1973年春周恩来在手术前，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周恩来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受到江青一伙的百般阻挠。为此，叶剑英愤而作诗曰：“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体现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其次，整顿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1971年12月，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理调整，收到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1973年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第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1972年7月30日，周恩来指示叶剑英等人将气象局的业务抓起来。1972年秋，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不久，部分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发展必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否定，这就引来了江青一伙的疯狂反扑，同时也引起了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认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这样就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1974年初，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为巩固和扩大他们已取得的权势服务。1974年1月，江青连续两次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央及国家机关干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竟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各处写信、送材料，煽动“夺权”，还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利用“影射史学”，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汪青一伙的破坏捣乱下，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出现动荡和混乱。

其次，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严重的混乱。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

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对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进行否定，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行破坏，使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义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加深了。

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再度恶化，铁路堵塞，许多企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政治上日益动荡，思想上难以统一，愈加混乱，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和民族将会陷入严重的危机。面对暗淡的前景，人们无不忧心忡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希望究竟在哪里？人们在思索着。同时，人们也希望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天降大任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他不希望国家再度出现动乱局势。天下大乱然后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构想，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了，国家仍未实现“大治”，依然是一片混乱，因而毛泽东希望国家能尽快稳定下来，实现安定团结。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并且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同年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体现了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愿望。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理乱图治，振兴百业非靠富有经验，才华卓越的人不可。而江青一伙除善阴谋，善捣乱之外，则百无一能，百事无成。毛泽东也曾考虑让王洪文接班，并指定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考验，毛泽东发现王洪文与江青等人结成上海帮，参与江青阴谋组阁的活动，且资历、能力有限，毛泽东感到王洪文难以担当党和国家的重任。最后毛泽东还是把目光放在了久经考验，善于治国安邦的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此时，周恩来已经病重，难以正常地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毛泽东的视点集中在了邓小平的身上。因为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能力很强，是文武皆能的一把好手。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和拥护，自然也招致了江青集团的疯狂阻挠和破坏。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就打破了“四人帮”要让张春桥任第一副总理的计划。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1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首先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让邓小平表态。邓小平毫不退让。江青等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愤已极，拂袖而去。江青一伙，以为抓住了口实，当夜密谋，决定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但是，王洪文告状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受到批评。10月20日，毛泽东作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的指示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陪同外宾前来的邓小平，对邓

小平对江青的斗争表示了肯定，并要邓小平勇敢地承担起中央所赋予的重任。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当着王洪文的面说，邓小平比王洪文强。这无异是对王洪文的当头一棒。毛泽东还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吧！”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1人为副总理。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新的国务院成员，有四分之三是老干部组成，新的部长有10位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四届人大的召开，宣告了江青一伙组阁阴谋的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说明毛泽东具有伟大战略家的眼光。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后。他便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

第四章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

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毫不例外并且十分明确地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首要的基本任务，这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其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的能否改善以及改善的程度高低。居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只有将其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才能以其产品的极大丰富去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并以在这种繁荣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社会的意识去取代旧的思想内容。反之，“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

第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阵营的竞争和斗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和根本点在于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从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对战胜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归根到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为中心。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但资本主义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只有在这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富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竞争的胜利。

第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需要。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逐渐消亡，将人类社会推进到共产主义。其中，生产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无一例外地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前提。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必须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以此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最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 1975 年全面整顿中，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1 卷，3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3 卷，222 页~22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 4 卷、1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其独特的深邃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就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在同居于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到思想见解的正确观点。

二、“三项指示为纲”

面对我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国民经济持续滑坡，而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邓小平以较为灵活的策略方式，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公开斗争的旗帜。这是我们党内正确领导继1976年“二月抗争”和批判极左思潮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努力。

1. “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由此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他认识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下降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倚重周恩来，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卓越的才能、挽救急速下降的国民经济的同时，又相继批准了“四人帮”所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周恩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下滑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经济领域中大搞所谓的走资派，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到1974年主要表现在：

第一，铁路运输严重堵塞。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打乱了原来建立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加上派性之间的争斗，致使铁路运输难以正点运行，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仅1974年就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重大事故755起。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严重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的生活。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

第二，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四人帮”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的鼓动下，经济部门的斗、批、改和夺权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仅1974年，全国就少产钢700多万吨。

第三，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财政收入继续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增长1.4%、只完成计划的19.7%；许多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产品如钢、原煤、棉纱等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96.6亿元，出现了7.7亿元的财政赤字。其它如军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能否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是整顿得以进行的关键所在。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思想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回归。1971年秋，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说明了这场“革命”的失败。“轰轰烈烈”、“势不可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在思想感情上重新与以周恩来力代表的老同志接近，以使不断恶化的国家政治局面和国民经济的状态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努力下，能够得以好转。1972年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周恩来身患癌症的残酷现实，则需要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选，来力挽严重动荡的狂潮，协助毛泽东治国安邦。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又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此时提名重用邓小平，是如下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接替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总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才能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瞩目和敬佩。但是，当时他已患癌症住院治疗，无情的客观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找出一个接替他的人。

其次，接替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具备条件。

再次，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虽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印象是好的，毛泽东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之后又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这样比较历史地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

最后，主观上，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产生了疑虑。林彪集团瓦解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发展到鼎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保证“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同时认为作为才能平庸的王洪文等人是难以担负起安邦治国重任的，而这股势力的恶性发展已引起他的警觉和不安，急需一个具有较高治国才能的代表人物对“四人帮”集团予以牵制，这也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在指导思想，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路线的实质上，周恩来认为，林彪一伙所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主张大力纠“左”，力图通过对“左”倾错误思潮的纠正，来逐步引导“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四人帮”出于乱中夺权的需要，抛出了林彪一伙“一向是极右的……他们所宣扬的‘左’的词句仅仅是用来包藏他们右的实质”的论断，在周恩来与“四人帮”关于批林批孔的基本方针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错误地否定了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断言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继续肯定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方针，使这种“左”倾错误理论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仍占居着主导地位。到1975年，主要表现在：

首先，仍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红旗》，42期，1972。

《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5年1月1日。

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之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引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提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认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他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工资的原则区别，甚至把林彪集团的上台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联系起来，要求人们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显而易见，毛泽东既要整治已经“天下大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又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以，他一方面谨慎地选择了既有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有很高的威望和卓越才华的邓小平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好转与复苏。另一方面，他对“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邓小平又不放心，所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双管齐下”，既安排了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同时再次抬举“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以此来牵制邓小平，倚重他们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以此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所以邓小平针对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采取了颇有斗争艺术的策略。

1975年2月，邓小平以对铁路运输的整顿为先声，揭开全面整顿的序幕。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主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部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一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5月8日到29日，邓小平在北京又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从而首次提出了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

2.“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都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它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作出的讲话和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385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第一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反映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心理，仍然带有“左”的色彩。邓小平将其放在第一位，是以此淡化“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冲突，借以掩盖“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以求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对该项指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出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基本上不提所谓的“走资派”，很少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突出地强调批判派性，强调打击一小撮破坏生产的坏人，提出整顿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子头所向不言而喻。

第二项，要安定团结，反映了毛泽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9年动乱，也希望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思想。这和邓小平要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提供一个必备的稳定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反映了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清除工人阶级和党内不断滋生的所谓走资派，另一面，又希望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并不断下降的状况有所好转的心态。虽然“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最后，但它却是邓小平重新复出以来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在三项指示中，“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它是前二项指示的目的，从反修防修到安定团结，尽管毛泽东有不同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反修防修除了用以掩盖三项指示的核心，取得毛泽东的认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它和安定团结一起消除派性，制止动乱，创造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三项指示中，前两项是手段，而最后一项则是邓小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其次，它反映了邓小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大局的思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以国民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现代化和国民经济二者之间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步骤，所以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中重提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深刻的含义在于借毛泽东的话把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落到实处。

3.“三项指示为纲”的作用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句句是真理”、“句句闪光辉”、“最高指示”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是没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涵义和非凡作用的。但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整体，明确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并上升到“纲”的高度，则赋予了它非同小可的巨大蕴力，在全面整顿中展示了它拨正航向入坦途，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

第一，在理论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违理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杆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其理论的核心和主要内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为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被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原因。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的计划是“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但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通过的党章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照此逻辑，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而使这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期限地继续进行下去的理论依据。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不仅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条件下，否定了它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第二，在政治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沉重地打击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恢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依据“三项指示为纲”中的“要安定团结”，对于“四人帮”集团闹派性，搞小圈子的错误行为给予了严正的斗争。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了他们的帮派言行，使他们在政治上一度陷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境地，江青和王洪文不得不作检讨，这对自“文革”以来长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军队的整顿，打破了他们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清除了他们插手军队的势力，保证了军队的稳定，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为防止他们利用军队颠覆党和国家的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他们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大搞派性斗争的爪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极左势力，使其猖狂之极的嚣张气焰有了一定的收敛。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极左势力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批林批孔所导致的混乱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开始出现。

第三，在经济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在整顿的实践中，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在整顿中，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提到“纲”的高度，并明确提出：“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那种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1版，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董存保：《杨余博蒙难记》，《东方记事》，第1期，1988。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也是邓小平为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从而在经济领域中力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首先，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了较大改观，原油、原煤、发电量等均创历史上月产量的最高水平。同上一相比，“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为15.196；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其次，国家基本建设也有较大增长，这一时期建成了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也建成通车。再次，通过调整我国对外援助的支出，适应了我国国力能承担的能力。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做到了收支基本平衡。

“三项指示为纲”的宗旨在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其核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地公开提出否认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为纲。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不足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5年，其斗争的形势虽然错综复杂，但斗争的基本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斗争，这是1975年斗争的主线。

二是邓小平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三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以便乱中夺权，同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阻止其“左”倾势力恶性发展的矛盾。

邓小平在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如果明确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否定，非但不能起到纠“左”的目的，甚至连1975年的其它各项整顿工作也难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08页~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三、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理论家、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为彻底揭穿张春桥、姚文元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极左错误理论，全面地阐述和宣传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好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促进整顿工作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邓力群同志，从8月份开始，主持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根据整顿工作全面开展以来，邓小平多次的讲话、指示精神和实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继续努力的工作方向而起草的，原拟定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的创刊号上发表。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的修改。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文章没能定稿，更没能发表，只是后来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时，人们才看到它。

《论总纲》针对性极强，火药味极浓。它既批评了“左”倾错误，又无情地揭露了江青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篇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战斗檄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论总纲》是对“三项指示为纲”全面系统地深刻阐述。《论总纲》全文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文中写到：“‘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总纲。”如果说“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鲜明斗争旗帜，那么《论总纲》则是围绕这面旗帜所进行的科学系统的理论阐明。

第一，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论总纲》针对“四人帮”集团订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制造动乱，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接着《论总纲》层层递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人帮”集团的种种具体阴谋活动：

“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

同时《论总纲》又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行为。提出了判别其错误的一些观点：

“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

造反，就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对‘反潮流’，就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

应该看到，《论总纲》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反修防修”的阐明同毛泽东的本意是有所差异的。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就是要人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以防止他人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复辟。而《论总纲》则是要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增强识破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去判别和制止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大搞派性，制造混乱，进而乱中夺权阴谋的实现。所以《论总纲》的这种解释大大淡化了毛泽东本意中所具有的“左”的含义，将人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理解引向了较为正确的方向。

第二，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论总纲》指出：“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进而指出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论总纲》以犀利的文笔，严谨的逻辑，阐明了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

《论总纲》锋芒毕露，直刺“四人帮”的要害，指出导致动乱的具体行为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

关于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的前提，《论总纲》指出：必须“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遵照党的基本路线的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 and 是非界线。同时“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释义上，《论总纲》以毛泽东的“现在以安定为好”开头，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结尾，围绕实现安定团结这个中心，全面科学地剖析了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提出了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既是对以“四人

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制造动乱、打击和迫害党内健康力量的愤怒声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本身，其目的是要纠正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详尽地阐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三项指示为纲”中的中心地位，《论总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主席所提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对于“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错误理论，《论总纲》指出：他们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要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为进一步阐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彻底揭穿“四人帮”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论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于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还是假于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盾中的人才会相信。”《论总纲》最后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

《论总纲》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科学地阐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在批判“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将经济的发展提到了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标准的高度，展示了邓小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坚强决心，反映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务实作风。

其次，《论总纲》澄清了长期以来被“四人帮”混淆的理论是非。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针对“四人帮”大批经验主义，否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错误行为，《论总纲》指出：“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

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

“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1 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对立面问题。针对“四人帮”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行为，《论总纲》指出：一些人“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对立面，总是把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相互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批判“四人帮”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现象，《论总纲》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作用，“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论总纲》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阐述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揭穿“四人帮”集团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以及极左理论的错误实质，启迪人民的思想觉悟，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实现党和国寨平作重心再次转移的预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关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1.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第一次努力 1956年,我国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后，建国初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显然不符合国内的现状，力重新分析、判断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确定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大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大会认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基于上述主要矛盾的分析，中共八大认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尽管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在理论上有不完备的地方，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认为我国的社会制度整个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或者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已不存在继续改进的问题，因而影响人们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但是，上述提法的着眼点，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所以中共八大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确定是合乎实际的，这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第一次重大转移，即由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以革命的手段解放社会生产力转移到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中共八大的这一战略决策，代表了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中共八大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问题，揭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但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不够成熟，加上缺乏必备的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使中共八大所作出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的“阶级斗争”，以致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2. 承前启后的伟大尝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经历了极端艰。难曲折的过程，但一直没有停止过。

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情况下，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掀起了一场公开的旨在反对“左”倾错误的“二月抗争”。斗争虽然被压制下去，但它毕竟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公开抵制，是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大义凛然的斗争，可以说它开创了我们党内健康力量以公开否定态度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造成的恶果，在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有了不同认识，部分人开始觉醒的情况下，作了坚持不懈的纠“左”斗争，明确提出了“‘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当时独撑危局、力挽狂澜的情况下，以较为缓和的方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左”倾错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努力，也是1976年“二月抗争”中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但是这一正义的斗争由于“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毛泽东在全局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而再次受到了挫折。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二月抗争”和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继续和深化。是党内健康力量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正确轨道上的一次重大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伟大作用。承前，是它继承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与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路线，启后，是它启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来，揭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三项指示力纲”的提出，从根本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实际上肯定了中共八大关于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下降为社会的次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正目的和实质是实现党和国

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对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述，从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到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的大局，从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等，无一不是旨在恢复和坚持中共八大所规定的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昭示世人：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都要始终如一地搞经济建设，使之不受任何干扰。从邓小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讲话的中心内容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是紧密衔接的。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

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其次，在实践的效应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件的制定，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整顿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在全面整顿中提出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各行各业经过整顿，全国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摆脱了停滞状态，有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的价格计算）达到4504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80亿元；粮食、钢铁、原煤等主要生产指标都有明显的增长。

全面整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产主了强烈的反响，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失去了过去诱人的光环，人们迫切地感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衷地拥护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大决策。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要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要修正主义的中国……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以及“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同祭告总理”的悲壮诗句，是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诗词的共同主题。也是亿万群众异口同声喊出的时代最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1版，189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

《三中全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版，上册，4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音。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重申的，也是 1975 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整顿，所力图实现的大局。所以，正是 1975 年的全面整顿所产生的巨大效应的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顺利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否则，没有全面整顿这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预演，就难以唤起全国人民的觉醒、信任和支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迅速完成。当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也不可能迅速地提出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五章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最初交锋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这条思想路线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1. 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提出实事求是思想的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个阶级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基础上，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领导力量和同盟军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正确地估量了形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阐述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规律，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硕果。

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个决议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及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文章针对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客观实际，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挥舞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指挥一切，造成中国革命部分地区陷于被动的现象指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并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实质上指明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因此，古田会议的决议和《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仅没有被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反而被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论”而加以指责和排斥。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毛泽东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胜利的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这是战争指挥中的实事求是思想，因而这篇文章成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先导。《实践论》、《矛盾论》是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重要著作。它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论证。这两篇著作，就其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而言，就其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批判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全党正确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3个报告。报告在批判主观主义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第

一次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解释，这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简明论述。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的七大报告把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成为全党的行动准则。至此，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形成。

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曲折发展建国后，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间，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切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我国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但是，在胜利面前，毛泽东逐步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国国内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在政治上导致了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又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毛泽东为纠正他所认识到的“左”倾错误，曾把 1961 年定为“调查年”，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但由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恢复，这些错误非但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相反，1966 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民主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脱离中国的实际状况，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致使党的思想路线受到了严重干扰。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需要，割裂毛泽东思想体系，将毛泽东的每一句话奉为“最高指示”，在个人崇拜盛行下，党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破坏。

二、毛泽东思想宣传中的误区

1. 毛泽东是天才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由此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崇高地位。但在他的晚年，这种崇高威望不幸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打出了“毛泽东是古今中外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天才”，“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林彪、“四人帮”制造个人崇拜时，毛泽东也认为，在特殊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总要有个人崇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来源于群众，是群众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所以尊重领袖、热爱领袖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夸大领袖的作用，将领袖神化和偶像化。否则，只能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严重践踏。

2. 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曾作过许多讲话，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对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见解。也由此使得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但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林彪集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和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四人帮”则提出，对于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当作毛泽东思想，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真理都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它必然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是不存在任何思想顶峰的。并且，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应该是领袖必须遵守的“最高指示”。而不是反过来把领袖个人的话当作人民必须遵守的“最高指示”。集中代表了人民意志的党的决定和领导者的指示，当然是应该贯彻执行，但人民群众在领袖面前，不应该只是扮演“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样一种完全服从照办的消极角色。否则，对于党和人民，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都是贻害无穷的。只能导致人们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下，思想的停滞不前和更加僵化。

3. 毛泽东的话等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言，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才在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之内。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宣称，“毛主席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谁反对毛主席的话，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种把毛泽东的话等同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它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原则，导致人们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作为毛泽东思想来予以宣传，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办。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版，33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上述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所产生的误区，是造成党的思想路线遭受破坏的主要症结。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那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难以得到恢复和贯彻，全面整顿的工作也就难以深入地进行下去。所以，科学地阐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成为思想战线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述

1975年初，宣传理论战线仍然是被“四人帮”严密把持的一个阵地。“批林批孔”以来，全国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局面。为打破当时的所谓理论家张春桥、姚文元一统宣传天下的局面，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果断地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另起炉灶。1975年6月，在他的倡导下，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员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邓力群等理论工作者。他们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于7月上旬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整理成文，以便作为全国学理论的主要文献公开发表。但由于毛泽东表示“暂不公开”，而未能实现。

二是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撤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军工宣队，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恢复长期停止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活动。

三是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筹办刊物《思想战线》，与“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胡乔木指出：“现在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同时，邓小平针对林彪、“四人帮”集团将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下，阐明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1，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样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的其它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在这里，邓小平借批判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实指“四人帮”继续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他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已经展示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

2.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听风就是雨邓小平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述，实质上蕴含着如下的思想观点。

其一，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成果，而不是毛泽东个人全部言论的总汇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因此，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认为毛泽东的所有言论都是真理。“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十年后的评说》，1版，124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页~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其二，要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毛泽东思想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它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因此，不能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

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提出，是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一个大胆的、清醒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超人的勇气。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在毛泽东思想仍然被视为禁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里，邓小平提出怎么能够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这既是对个人崇拜的直接宣战，同时更是对“四人帮”集团假借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作为毛泽东思想和“最高指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左”倾愚民政策的有力冲击。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清醒的举动，因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必须把全国人民从长期盛行的“左”倾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被“四人帮”集团利甲肢解、割裂的手段，通过片面地解释、宣传，以把自己装扮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继续维护“左”倾错误理论的一个重要武器。所以，正确地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思想，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不仅仅是党的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果断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一套，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优良作风。正因为我们实行了这种作风，才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些重要的论述、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做了重要准备。

四、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1.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集团以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彻底清查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和陈云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但是，这些要求遭到了抵制和阻挠。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要求“继续批邓”之后，又重申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对于“四人帮”的流毒很广的反动文章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口号等则设下层层禁区，不准批判，使揭、批、查运动难以深入开展，拨乱反正工作也难以顺利进行。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思想。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讲话贯穿“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阐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及其成果的必要性。讲话强调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两个凡是”的提出，作为一道巨大的、无形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制造着新的思想僵化。它是模糊思想目标、松懈斗志、瓦解精神的腐蚀剂。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用不着思考，用不着创新，只要按照毛泽东所说的去办（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行。它所造成的结果正如耿飏同志所说：“这等于没有粹碎‘四人帮’。”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续践踏。

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能否真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取决于党的思想路线是否端正。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实践上看，不纠正还禁锢着人们头脑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是非就分不清楚，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大批冤假错案，就不能得到解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就提不到议事日程，即使提出了也不可能转变过来。因此，纠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较长时期毛泽东所推行的“左”倾错误理论，正本清源，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前提条件，是摆在全党面前的艰巨任务。

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

李济琛：《千秋功过》.1版，36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对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指出：“我们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十分明显，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还仅仅是从正面提出的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问题，但它是针对着“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已经预示着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分开的观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出了主观的东西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有力驳斥和根本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也遭到了坚持“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非议。在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指责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甚至提出，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并采用高压手段，企图将这场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得以恢复的大讨论压制下去。

邓小平自始至终十分关注大讨论的进行，在关键时刻给予了鲜明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很快成为全党思想解放的锐利武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以鲜明的观点、充分的论据、雄辩的事实、严密的逻辑、周详的内容，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4页、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对于大讨论以有机的配合和坚决的支持。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月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最后他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定下了基调。

2.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围绕着把党的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决定了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思想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会议深入讨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钻研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才能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才能正确地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会议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所以，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至此，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精髓和核心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得以确立。

3, 全面整顿与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从1975年的不能把“老三篇”、”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4页、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版（上卷），12页—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到“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再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力图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同“左”倾错误的斗争虽几经起伏，但斗争和努力的轨迹却是十分清晰的，走出了一条由浅入深、由思想准备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思想发起猛烈冲击，再到冲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束缚。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那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则是为确立党的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同“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决战。而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提出和阐述可以说是围绕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左”倾错误进行的最初交锋。

首先，从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阐述的内容看。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是从正面提出的，虽然他还仅仅是提出了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不等于毛泽东思想，但这些朴实中肯的话语中，

已经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所提出的“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等是对1975年全面整顿中关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尽管这种阐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和“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一相互连贯的主题思想内容给予了丰富和完善，最终引伸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其次，从邓小平围绕毛泽东思想问题，同“左”倾错误斗争的目的看。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在表面看来，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性问题。但邓小平在这个理论性问题上同“四人帮”斗争的目的不仅仅是如何恢复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斗争的实质是借着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达到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目的。虽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的这种努力未能实现，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邓小平同“左”倾错误坚持不懈的继续斗争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将这个未能如愿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再次，从斗争的效应看。《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锐利的笔锋，指出了“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质，说明了他们“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而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曲解毛泽东思想的丑恶行径。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本来面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提出不能“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不等于毛泽东思想则起到了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作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话的盲目崇拜和盲目服从，转而以理性的思考重新认识判断真理标准的问题，对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所以，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情参加和坚强有力地支持行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得益于1975年全面整顿中的思想

准备。

第六章第二次革命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改革为中心的革命，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场改革正式开始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它在 1975 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已拉开了序幕，只是“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整顿

1. 全面整顿的先声

全面整顿，铁路先行。这是邓小平 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经过深入地细致地观察分析而定下的结论。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许多铁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货运量比上年下降 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没有希望。

2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 月 5 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接着，他分析了全国工业的形势，尖锐地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会后，下发了“中发〔1975〕9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件在分析铁路运输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作出了迅速改变铁路运输被动状况的决定。

第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第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第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省、市、自治区统一部署。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与沿线群众的关系。

第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须的，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第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依法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 9 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并响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 9 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会后，万里亲赴徐州、郑州、南昌等问题比较严重的铁路局，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对全国的铁路系统开始了整顿。调整了一些路局搞资产阶级派性，闹不团结的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坏人，恢复和健全了铁路的规章制

度，疏通了严重堵塞的路局和车站，从而扭转了铁路运输的被动局面，从3月份起，铁路运输做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对铁路运输的整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抱以热烈欢迎的态度。邓小平抓住时机，及时将整顿工作引向深入。3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提出：“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了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于是，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地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

5月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两次到会发表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关于钢铁工业整顿的讲话全面地概括了铁路整顿的基本经验，比他关于铁路运输的整顿的讲话有了新的发展。至此，中央关于进行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都已明确地显露出来。

2，整顿和反整顿的公开较量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进行，遭到了来自“四人帮”集团的猖狂反扑。1975年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文章别有用心地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文章指出：“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江青4月4日在给迟群的电话指示中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要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等等。

“四人帮”如此大加笔伐“经验主义”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是借批“经验主义”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四届人大组阁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重用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有功的老同志，依靠在国家管理和建设上有能力、有威望、有经验的老干部。这正是周恩来被“打”而又不“倒”，邓小平被“打倒”又东山再起的原因之一。因此，“反经验主义”就很有特殊意义了。以利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小平等一大批党内正确领导力量，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面对“四人帮”的挑衅，邓小平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不计个人荣誉和地位的得失，冒着第三次被打倒的危险，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为打退“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邓小平在同“四人帮”进行直接

斗争的同时，继续推进整顿工作的深入进行。9月，他指示李先念和国家计委的有关同志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文件体现了1975年以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的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工业的许多正确的或较为正确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一个力图在经济上治“文化大革命”之乱，并对中国工业进行改革尝试的文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有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

第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于擅自向企业摊派生产，调出产品，抽调资金、劳力、设备、材料的，企业有权抵制。

第三，改革管理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该下放的企业，要坚持下放给地方管理，除了跨省、市的铁路、邮电、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和远洋航运，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和专业施工队伍，由中央各部力主管理外，其余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还没有下放的，或由中央各部代管的，都应当根据条件，逐步地下放给地方管理，或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第四，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不能用的东西，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有权拒绝收购。企业都要以产量多、质量好、消耗低、积累多为光荣，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凡是未达到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较好水平的，要尽快达到；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水平。

第五，精兵简政。做好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产人员，提高工时利用率。

第六，加强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所有企业都要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同时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健全下列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1）岗位责任制；（2）考勤制度；（3）技术操作规程；（4）质量检查制；（5）设备管理和维修制；（6）安全生产制；（7）经济核算制。其中岗位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个工人、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工业二十条”的制定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工业战线整顿的深入，冶金部根据“二十条”的主要内容，及时采取了整顿措施。对不健全的规章制度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建立了与现状相适应的新的规程，使全国钢铁工业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一直欠产严重、拖了全国钢铁生产后腿的鞍、武、包、大四大钢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并开始补还欠帐。7月17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

二、科技工作的整顿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虽然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但当它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之中，就会转化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并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所以，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的先进与否，对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技工作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国的科技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整个科技领域几乎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

首先，科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遭到了歪曲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建国后17年所执行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受人们赞同的“科学十四条”等，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被加上了一个特殊的定语“资产阶级”；科学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是“专家路线”、“崇洋媚外”等。为了扭转“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江青、陈伯达等把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提出了“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地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并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正式出版《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其次，科技工作人员受到严重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或“特务”，许多科学家被打成追随“美帝”或“苏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复辟基础”、“个人名利”、“知识私有”、“技术挂帅”等。1971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把知识份子看作是“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的“臭老九”。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立案审查或非法监禁。许多科技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再次，科研机构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将中国科学院视为“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打碎、砸烂”的“堡垒”。1967年，科学院被造反派夺权，群众造反派的头头开始进入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1968年，在“斗、批、改”中，军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在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科学院的领导班子成了执行“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得力工具。在他们的策划下，中科院的科研机构出现了较大变动。一些研究所被撤销或被下放到地方，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被损毁和散失，一些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领导班子的改组和研究机构的肢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性质和任务，使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

2. 中国科学院的早春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

而如果“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技工作的整顿迫在眉睫。为此，他重新启用了光明磊落、敢于同“左”倾势力进行斗争的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委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

吹响了科技工作整顿的号角。

(1) 胡耀邦要科学院刮起十二级台风。7月18日，

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开始工作。为了澄清被“四人帮”集团混淆的关于科学技术的一些理论是非，重新唤起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他深入基层，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提出，“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打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号召，科学院要刮起台风，“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了遗传所党委的汇报后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因此，“所有的工作为一个目标，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为实现上述目标，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精神，在李昌、王光伟等同志协助下，对科学院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整顿。

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正确的科技工作政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科学院的工作实际上由胡耀邦主持。他到任后，首先取消了造反派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调刘华清、王屏，增补武衡、胡克实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同时改变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任务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虽然在当时科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还存在，但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以胡耀邦为首的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为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落实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始终是胡耀邦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他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比较精通或比较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他常说，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讲，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的讲话中，明确驳斥了所谓恢复室主任是复旧的说法，指出：“说室主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不是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

为了使更多的科技工作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对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本着专业对口的原则，进行了工作调整。同时，他深入

调查、发掘被埋没的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向大家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胡耀邦等人的艰巨努力，先后有800多名科技人员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了科研工作岗位。胡耀邦还从大家议论很多的生活困难人手，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夫妻分居、煤气炉子、子女上学等问题。使深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焕发了活力，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其次是整顿思想，把科学研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胡耀邦认为“思想作风的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科学工作方针政策的真正落实。影响着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技工作”。“科技工作的整顿以思想整顿为主”。

为使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中央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宣布：“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的故事。我假使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青人……”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他提出的“新的长征”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为系统纠正科技战线的“左”倾错误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我们党的正确科技工作理论和思想，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个关于党的科技思想的文件，下发全党。在他的指示下，胡耀邦根据1961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和李昌、胡克实等人一起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纲》重点阐述了需要正确处理的六个关系。

第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纲》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部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可行的业务领导。”领导干部懂得很多的业务、技术是困难的，但是不学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过问业务，也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第三、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

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推广科研成果。

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要注意把生产试验研究同实验室的试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还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而必须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研究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第四，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同时，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

第五，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需要的。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需要的。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

《汇报提纲》在起草过程中，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当时深受压抑的广大科技人员看到了新的希望。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1.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

1875年春天，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

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计划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马克思针对起草的统一党的纲领草案，写下了《对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文。文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等含混不清的空话时，阐明了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的分配，至于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人（例如老人和小孩）的需要不可能“平等”。就消费资料在各个劳动者中间的分配而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行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马克思所以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它们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权利。就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来说，一切商品所有制都适用同样价值的尺度，因此，他们在价值尺度面前是平等的；就按劳分配而言，在劳动尺度面前，交换的双方也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按劳分配本身就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1974年10月，他同丹麦首相哈特林的谈话所说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虽然他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略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

其二，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是在非常严格意义上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的。但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分配关系以外。1958年，他曾列举过“资产阶级权利”在我国现实生

活中的种种表现，除了薪金制、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等属于分配关系外，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列举了很多。在毛泽东看来，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甚至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这样，他就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

其三，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破除的弊病，1958年秋，毛泽东提出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时，就产生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意向。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种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同年郑州会议前夕，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他把“资产阶级权利”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两部分，

一部分保护，一部分废除。这表明，他把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变成了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政策措施。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他再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指出：“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所有制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形‘左’实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了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说法，但是，这里所论及的问题，不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把对待这类“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看成了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划分是不是“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志。1975年初，他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也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在他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仍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应予消除的弊端，所谓“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说法，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2. 张春桥、姚文元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歪曲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为张春桥、姚文元利用误解，大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1975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写道：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

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 unlimited 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它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4月，张春桥在他所撰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林彪一类人物如果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姚文元和张春桥的两篇文章，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法权必然导致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逻辑出发，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废除“按劳分配”等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正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但是，两篇文章的错误却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当作资本主义因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们故意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平等交换的性质区别，掩盖了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和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以及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着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第二，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看作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存在，“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没有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从经济基础上铲除资产阶级提供了保证，至于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违法犯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第4期，1975。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第4期，1975。

罪分子，那是属于社会主义在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从根本上否认了按劳分配原则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劳动积极性，以创造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即“社会主义能够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

所以，能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政策，澄清人们头脑中的糊涂观念，是解放人们的思想，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前提。于是，邓小平知难而进，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

3.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的科学阐述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在工资问题上，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既反对高低悬殊，也反对平均主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阐述了按劳分配原则：

第一，要明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二，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按照职工的劳动态度、技术业务能力、劳动和工作中的贡献，每一两年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待遇。

同时，要对高温、高空、井下、野外、有毒、有害等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

第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教育职工，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生活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劳动，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

邓小平的指示和国家计委的规定是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作为资本主义因素而加以批判的“左”倾错误行为的直接斗争，也是对毛泽东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的有效抵制。邓小平虽然没有就“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正确分配政策作过多的阐述和解释，但他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等，则是立足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而得出的正确结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这也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在民众心理上占统治地位，而毛泽东并不否认，“四人帮”又加以强化的“平均主义”小农传统意识的根本否定。它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冲击，松动了长期束缚人们的封建主义枷锁，在一定程度上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0页~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的形成作了思想准备。

四、整顿：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 1975 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以其特有的魄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阐述了他对工业、科技等领域的整顿思想和一些具体的整顿措施。虽然内容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改革”二字，但就其整顿的实质和实践效果而言，是在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我国各行各业存在弊端的革故鼎新。正如邓小平所言，只是“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这些改革试验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深得人心。尤其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在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解放了原有的生产力，而且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即是这种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它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解放生产力的旧思路，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正确途径。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比起 1975 年的整顿来，要深刻得多了，广泛得多了，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的确应该追溯到 1975 年”。

第一，从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整顿看。邓小平在 1975 年关于工交问题整顿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国家计委所制定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阐述的具体整顿措施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前者已经预示了后来改革思想的萌芽。

首先，在党委与企业行政的关系上。从 1975 年整顿中的“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力图实行党委和企业行政分开的一种努力和实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实行党委和企业行政分工负责和 80 年代中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展示了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初期改革目标的雏型。

其次，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所提出的“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必须把体制改革工作坚持下去，该下放的企业，要坚持下放给地方管理……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我国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有限改革。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为进一步简政放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种放权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它对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统得过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从松绑放权所产生的效应上，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又作出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和企业的“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重要改革举措。

再次，在建立企业的管理制度上。从 1975 年提出的“责任制是企业规章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25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胡绳：《中国共产党六十年》，1 版，455 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制度的核心……每个干部，每个工人，每个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必须在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前者是后者的序曲，后者是前者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第二，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看。在 1975 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所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遵循着这一正确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作了新的阐述和发展，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根据邓小平的新阐述，在中共十四大上，终于作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从 1975 年重提“按劳分配”到“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到中共十四大所规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三者之间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三，从科技工作的整顿看。

首先，科技战线的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科技政策的公开抵制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在科技整顿中，从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是科技整顿工作的重要特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多次讲话以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充分肯定建国后我国科技工作成绩的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所受的干扰和破坏。表现了敢于正视问题和差距的巨大勇气。这种肯定和正视，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否定。在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科学与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建国以来在科技、文教等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不仅尖锐地驳斥了“四人帮”的极左理论，而且科学地阐明了我们党在科技工作中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科技工作中的争论作了基本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工作，标志着党内代表正确发展趋向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思想的日益觉醒，是由被动抵制“左”倾错误到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环节。

其次，邓小平、胡耀邦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科研工作要走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前面；科技人员是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战略思想，是在 70 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以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重新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的集中反映。这不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否定，而且孕育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这种思想认识，顺应了世界潮流、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为 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15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江泽民：《加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 版，1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第七章加强党的正确领导的努力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在整个革命进程中，无论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始终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革命政党的领导。1973年3月，邓小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前提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分割的。

1. 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而无产阶级要形成一个阶级的整体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创造性活动，才能把无产者组织起来，并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由自发的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联合起来，目标一致地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组织和发动群众，使革命和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航向，一步一步引向胜利，最终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

2.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由于没有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相继失败。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但它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虽然它具有革命的一面，但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勇气，也不可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中国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同时他们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中自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党成立之后7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并通过三大改造的完成，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

设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富强，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历史的结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正确的结论却被无视，出现了破坏党的领导和否定党的领导的现象。

二、“文革”中扭曲的领导体制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固然十分巨大；但它在政治上所创造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凿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先河。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 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达到凌驾于中央之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他不仅在很多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率先垂范，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形成和发扬。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是比较注意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的。他的个人专断的发生始于1958年对反冒进的批判。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种提法，为党内个人崇拜的盛行打开了绿灯，并直接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悲剧的发生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进步升级。这次会议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先后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都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加上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的推波助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不断发展。毛泽东曾认为“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这句话如果反映了毛泽东要利用个人崇拜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那么“文革”发动和刘少奇被打倒后，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理所应当收场。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遭受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和愚“忠”等儒家学说熏陶的民众思想意识，具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它的相对独立性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具备，则得以骤然爆发，毛泽东本人在“红语录”的海洋中，冉冉上升为“天神”，而他的每一句话则成为“最高指示”。在党中央内部，已经不是毛泽东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负责，而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了实现他各种“宏伟蓝图”的合法机器。尽管代表党内正确领导的力量也作过一定限度的抵制，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基本上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影响下，各级地方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滋长了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致使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他认为“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版，3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既然党和政府情况如此严重，在毛泽东看来，这场以“反修防修”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不能由当时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所以运动一开始，中央领导就围绕运动是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产生了分歧。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并引发了其它大学以针对党委为目标的摧毁“黑帮，黑组织”的造反运动。致使“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脱离党的领导的发展趋势。

1967年1月4日至1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的组织联合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2月5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文汇报》在《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的社论中宣称：“上海人民公社创立的伟大功绩在于：革命左派实现大联合，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它创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经验。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造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踢开党委，全面夺权之风迅速在全国蔓延。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由毛远新等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派支持下，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政权机构中，第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新机构。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社论号召“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从此全国各地的党政大权被夺后，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种极不正常的机构，“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产物，其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

“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采用“三结合”的形式。这种“三结合”之一，就是革命干部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总数的20%。“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也感到以前对干部队伍估计过于严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站不出来。开始强调革命干部的作用。因此在新成立的政权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但是，在“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干部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组成之二是革命群众的代表。又叫做“左”派或造反派的代表。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60%。毛泽东之所以要“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中，在于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打倒“走资派”可以依靠的力量。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对“左”派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了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家在“造反有理”的狂潮中，以群众的“左派”代表身份而进入“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之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组成之三是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20%。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介入地方夺权斗争，在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虽然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实际上在“革命委员会”中起到了主持工作的作用。

“革命委员会”就其性质来说，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左”倾领导体制。它以取代党组织的方式，集党政大权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集权，加上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导致了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严重倒退。

“革命委员会”是取代党委和政府的产物，所以从成立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不可否认，它对缓和夺权后的紧张局势，维持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左”倾方针影响下，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军队干部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介入“革命委员会”的，由于思想上缺乏准备，又不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加上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加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代表，因为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程序产生的，所以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和一些坏干部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不安定因素。致使全国一些地方的纷争和动荡继续发生，严重地危机着全国工业、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所以“革命委员会”在取代党的领导之后，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担负起领导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的重任。

三、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整党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他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混乱都是从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党的领导开始的。所以“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整顿”，但“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1. 整党的重点：“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后，如何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存在一个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来执行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所以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就是要使各级班子”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邓小平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关键是建立省一级领导。邓小平认为，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要“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中央“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为将设想变成现实，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重新起用一批为革命立下战功的老干部，充实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对追随“四人帮”，大搞派性的一些头头，采取“挂职下放”或“调虎离山”的办法，召集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初步得到恢复和加强。7月15日以整军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叶剑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击退了“四人帮”插手军队，乱中夺权的阴谋活动，有力地稳定了军队。

第二，要选择“敢字当头”的同志担任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邓小平指出，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第三，在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上采取逐级上升的方式。邓小平认为，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从基层做起，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吃大苦耐大劳。“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所以“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为尽快选拔培养出一批敢字当头的领导人员、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邓小平要求，“有经验的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留到企业或到工业领导机关当顾问”。

2.对派性要寸步不让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革命委员会”的产生使国家有了一个权力领导机关，但由于其组织成分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将造反组织的派性带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内部。这些派性的斗争成了继1967年“一月风暴”全面夺权之后，新的动乱根源。直接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安定。所以邓小平在1975年3月5日的工业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5月29日，他再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具体分析和正确对待“造反”和“反潮流”的问题。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都应当具体分析。“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要特别警惕少数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不能说参加过反潮流，参加过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

其次，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邓小平认为，派性产生的原因有二种，一是思想原因。由于“造反有理”和“全面夺权”的影响，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忘记了党的组织和纪律，滑向了宗派主义的泥坑。二是少数坏人的影响。“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坏人”，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故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页~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意制造派别事端，以便利用派性混水摸鱼，“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同时邓小平又专门具体分析了军队内部派性产生的原因。指出：“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有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

再次，提出了反对派性的方针和方式。邓小平指出，“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弄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本着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在方针上“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反对派性的方式上，邓小平指出：“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所谓调，就是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主要是调头头。调动后又出现个新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最后得以解决。所谓批，就是批评教育。通过对闹派性的人进行批评教育，认识到派性的危害和加强团结统一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谓斗，就是对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派性头头，“发动群众同他斗，寸上不让”。因为“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铁道部部长万里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文革”中，徐州铁路分局的内部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到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斗争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1975年2月26日，当时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的“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汪冰石。汪冰石乘混乱之机，从后门溜掉，藏身在煤矿，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踢派”抓不到第一书记，于2月28日抓到了市委副书记王铁民。于是他们押着王铁民，前去冲击市民兵指挥部，双方展开了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遭到失败，王铁民被抢跑，自己的大本营也被捣毁。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的斗争。一方面大造舆论攻势，致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一方面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武斗，一时间，徐州局势骤然紧张。

当时，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在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派性破坏了安定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团结，破坏了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派性是和无产阶级党性相对立的，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对于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

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你们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班长，要负担一点责任，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

在万里的领导下，铁路分局领导通过近 10 天的努力，将徐州的盘根错节的派性予以解决。

解决徐州派性的成效，带动了各行业反对派性斗争的深入。这必然引起靠乱中夺权的“四人帮”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掀起种种狂涛巨澜，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进行了猖狂的反扑。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毫不退让，并及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四人帮”集团。想以此打击“四人帮”在中央内部的派性体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宗派行为。

3. 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落实政策随着“敢字当头”的党的领导班子的建立，还必须要有一大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代表党的正确力量的干部来充实和支持党的领导机构，以壮大“左”倾势力斗争的力量，这样才能保证整顿的深入推进。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很多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幸存的大部分都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所以，邓小平指出，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他们尽快解放出来。

5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诚的女儿致信邓小平，提出了要求给贺诚予以分配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向毛泽东呈送了《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5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傅连璋被迫害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邓小平抓住这一契机，及时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引向深入。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设想。

第一，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

第二，落实政策，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第三，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没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

在叶剑英、率先念的协助下，邓小平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把属于人民

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版，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内部矛盾问题的人，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二是对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三是待释放、交换、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势力的斗争中的发展和壮大。这些被解放和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在各条战线上成了抓整顿、与“四人帮”继续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和使斗争的形势继续向党内正确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 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党内，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对党组织的冲击和影响，党的作风和纪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在整党中提出，现在，许多方面纪律松弛，影响很坏，危害甚大，必须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违反制度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严禁打击报复。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要按照党纪国法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决不能姑息纵容。7月17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处理方案。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的纪律，在加强对党员教育的同时，对“双突”中发展的党员，也都作了严肃处理。

党的优良作风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指出，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具体内容：

“要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对报喜不报忧，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老爷，搞特殊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照这个规矩办事。

5. 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

邓小平认为，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软、散、懒”的问题。一些单位的领导，有的怕字当头，不敢坚持原则，使党组织处于弱软无力的地位。”有的闹不团结，搞资产阶级派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不成核心”，所以，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全体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部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体党员，都要光明正大”，“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有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要在同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论总纲》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中提出的“党委一元化领导”，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缺陷的。但它的宗旨和指导思想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将一度被“革命委员会”夺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借以打击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为把全面整顿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组织基础。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

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深远影响

1975年的全面整顿虽然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而中途夭折。但在整顿中，随着党的各级组织力量的加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有了发展和壮大。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同“左”倾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对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为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首先，1976年3、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而这场运动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有着深刻渊源的。

(1) 从运动的主体看。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和社会青年等。其中还有少数老红军战士和党政方面的高级干部。这些群众的革命觉悟是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而且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场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青年人，都是在红旗下出生和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曾一度扰乱了他们的思想，但在1975年，受全面整顿的影响和洗涤，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逐步明确了是非曲直，辨明了真理和谬误。当“四人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真理的党内正确领导时，在强烈的革命正气和责任感的交互作用下，他们这种捍卫党的正确领导的正义行为也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篇题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作者，在被捕后审讯他的对话，可以清楚他说明这一点。问：“你为什么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王、张、江、姚）？”答：“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我对他们批邓不满，我是拥护邓副主席的。”问：“为什么拥护邓小平？”答：“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钢铁上升，火车正点，教育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中国向好的方向转，不是向坏的方向转。是前进，不是倒退。邓小平同志关心群众，替群众办事，所以我拥护他。”

群众拥护邓小平，并不是简单的拥护他个人，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党的正确力量的代表，拥护以他为代表的在全面整顿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党的正确领导。

(2) 从运动的领导组织看。“四五”运动从全局上来说，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但就许多具体单位来说，又是同党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如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于3月18日率领全系师生上街游行，事前曾向该系党总支作过汇报，并得到党总支书记的赞同和支持。曾被列为“01”反革命诗词“扬眉剑出鞘”的作者，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党组织和群众的保护下，“四人帮”始终未能抓到他。而上述这些党组织，正是在全面整顿中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如果没有1975年党的正确力量的恢复和壮大，那么，1976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难以达到当时的程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

发的运动。”

其次，加速了“四人帮”集团的迅速瓦解。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集团加速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提出：“今天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痼疾。经过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了断然措施。

接着，在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也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粉碎了他们的叛乱阴谋。

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汪东兴固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以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为基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的正确领导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对华国锋最后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1975年全面整顿中又被重新重用的一些老同志如王震、杨成武、肖劲光等，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起到了联络行动和稳定局势的作用。

2. 为拨乱反正的迅速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作了组织准备首先，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一开始就遇到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的阻挠和压制。面对重重压力，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大讨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的正确领导和在全面整顿中被重新起用的胡耀邦等一批坚持党的原则的老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公开的大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央一些部门，各省市党内正确力量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促成了这场讨论的逐步深入发展。

7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上，周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指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1978年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都公开表示了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态度。

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有力领导下，和胡耀邦，罗瑞卿等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下，在宋平、杨易辰、任仲夷等省委第一书记的带动下，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先后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做出主要贡献的胡耀邦、宋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在1975年前后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的党内正确领导，没有他们的参与、支持和领导，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组织上，更进一步壮大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力量。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权。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的本意，原订议题是：

(1) 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2) 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3) 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上的讲话。

由于党内正确力量的增强，会议一开始，就冲破了原订的议题和调子。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最为关注的6个重大问题。

(1)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

(2) 中央组织部“七七”决定和1940年的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

(3) 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叛徒”问题；

(4)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

(5)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

(6)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的发言十分热烈，都希望中央对6个问题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亲自参与了全面整顿并起到了打先锋作用的万里同志在华东组发言中说：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与会者还提到，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右倾翻案风”平反。

在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 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律平反，(3) 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4) 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 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 撤销中央专案组；(7) 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这样，原来华国锋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再次，促进了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在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党的领导干部，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从1978年至1981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能迅速地完成如此繁重的伟大历史任务，应该说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各级党组织。

与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了科学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八章重开国门的尝试

一、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 闭关自守的教训

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1949年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农业商品率很低。帝国主义凭借特权，在中国开商埠，设租界，夺取了关税制订权、海关管理权，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很小，而且年年入超。1878年至1948年的70年间，入超达400亿至500亿美元。进口以消费、奢侈品为主，出口以农产品、矿产品、手工业品为主，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完全是一个畸形的、半殖民地的外贸结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之下，中国民族工业凋零败落，大批农民破产，加之自然灾害不断，战乱频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国家统一、富强、独立的起点，也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1949年6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视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为这对于改善各国的经济状况，增加各国的相互了解，增进国际合作，都是很重要的。1956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洋为中用”

的方针。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

一贯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处于平等地位，根据双方的需要和可能，有来有往，互通有无，反对利用贸易剥削掠夺别国，反对贸易歧视，反对强加于人，要求重合同守信用。这些，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对外开放的构想付诸实践。鉴于当时国际上出现了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建国初期我们应把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一边的决策。这个决策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当时必须而且也只能这样做。

1949年12月16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亲自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访问。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这次出国访问硕果累累，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前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随后又同前苏联签订了创办联合公司，包括中苏民运航空公司、中苏大连修造轮船公司等经济协定。与此同时，与东欧国家也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开展了经济合作与交往，包括进行贸易和兴办合营公司等。建国之初，由于毛泽东、党中央正确制定了对外交往重点的战略，使我国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较顺利地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初步胜利，为日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积极加强与第三世界的交往，这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国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命运，因此，毛泽东对这些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同情心，热切地希望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

政治上能早日独立，而且在经济上也能早日强大起来。长期以来，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把它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1959年6月11日，他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向你们关门。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也应该对别的国家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做些贡献。我国要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应当互相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

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我国经济援助的重点。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原则是：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坚持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独立，不造成受援国对自己的依赖；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除必要的无息和低息贷款外，大力发展技术合作。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物资、设备注意质量，价格合理，我国实行对外经济援助的方式是多样的。如无息、低息贷款，经济技术协议，合营公司，劳务出口，承包工程等等。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不仅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配合外交斗争，对发展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有相当的作用。但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教训和问题：

第一，不量力而行。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应该主要是政治上道义上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外经济上的无偿援助太大了。有些年援外费用高达国民收入的7%，超过了国力负担的可能，影响了国内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

第二，平等互利不够。把对外经济援助看成是无偿的，对外只给不取，是单方面的援助，而不是互相支援。

第三，不接受外援，甚至不接受政治上无害、经济上无偿又下承担义务的援助。如按照国际惯例，我国发生自然灾害后可以接受国际组织的援助，但我们却不接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没有大规模利用外资。50年代从前苏联、东欧引进的400多个项目，主要是前苏联的156项，包括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等项目，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许多骨干企业，对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从前苏联贷款19亿美元，年息2.5%1965年还清。60年代，前苏联撕毁协议，我国同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来往大大缩小，重点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60年代以后我国进行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的80%都是与西方国家进行的。1962年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龙生产设备。从1968年至1972年引进中断。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国进一步打开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的外交关系，从而推动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1973年至1977年从日、德、美、法、荷等14个西方国家引进成套设备222项，包括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光学等项目，填补了我国工业中的许多空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规模不大，外援主要是政治性的，引进的外资很少，其中引进先进技术仅占引进外资的1%，是微不足道的。在政策上，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片面地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把开展对外经济关系斥之为“出卖资源”、“卖国求荣”、“洋奴

哲学”，把经济孤立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我国除有少量的外贸和外贸以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几乎全部中断，中国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2. 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历史的车轮驶入 70 年代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基于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和保障我国安全的考虑，果断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亲自批准进口一些国外先进的成套技术设备。这实际上为已经关上的中国大门打开了一条“缝”，为尔后中国走上对外开放之路铺上丁一块基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复出的邓小平努力拓宽这条“缝”，重新倡导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在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的全面整顿中，他十分强调要大胆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1975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专门强调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必要性。他指出“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如化纤厂搞起来了，缺少某些化工原料就不能生产，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他还提出了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国外技术设备，扩大进出口的设想，指出：“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5 年 9 月，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进一步提出：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与此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也强调了同样的政策思想，即坚持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指出“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去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而“认识差距是为了加紧努力，消灭差距”，因此，“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

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干扰破坏，邓小平提出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大政策”还未来得及贯彻实施，就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打断了。上述文件中提出的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发展自己的主张，也彼扣上“崇洋媚外”的罪名遭到了无理批判。但是，错误的批判往往使正确的主张更加扩大其影响。在党内外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心目中，邓小平所提出的引进技术。加速自身发展的主张，不仅没有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被否定，反而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邓小平文选》，1 版，2 版，第 3 卷，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2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二、国门，在惊涛中打开

1. 尝试重开国门的意义

邓小平在 1975 提出上述思想观点，是顶住了极左错误巨大压力的结果。他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为一项“大政策”去对待，旨在引起全党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破除“四人帮”附加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的一切诬陷之词，使我国经济走出自我封闭状态，开阔人们的眼界和思路，积极参加世界经济的分工和竞争，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它对我国后来全面实施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

2. 尘封网结国门的打开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十年浩劫的结束，开展同国外正常交往的障碍被排除了。为了早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把他在 1975 年考虑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大政策”作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

1978 年 3 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同年 5 月和 7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两次都提到：现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9 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明确地提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根据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抓住时机迅速地把上述关于开放政策的设想付诸于行动。在 1978 年，同国外签订了 22 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成交额达 78 亿美元。诚然，这项工作中也出现求成过急的失误（这是难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邓小平 1975 年提出的“大政策”，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实践，即将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8 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出，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取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与这一讲话相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决策的同时，明确地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指导方针。虽

《胡乔木文集》，2 版，第 2 卷，24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9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然此时尚未从文字上把这一方针明确表述为“对外开放”，但已清楚地表明，中国从此正式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及时地指出并纠正了1978年在对外引进工作中的失误，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积极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同时，邓小平不仅继续坚持三中全会确定的开放方针，而且还努力把它付诸于实际行动。

一是鼓励原工商业者为国家引进外资、建设四化发挥作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特地约集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著名工商业家在中南海紫光阁一起座谈如何加快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诚恳他说：我们现在搞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怎么办呢？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海外同胞、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轻纺工业、手工业、旅游业都可以搞，资金周转得快一点。邓小平鼓励他们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赚取外汇，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的热情鼓励，唤起了几位著名实业家的爱国热情和事业心。荣毅仁先生很快就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建议：按国际惯例，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外，主要承担起推动在中国当属新兴事业的引进外资工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他告诉荣毅仁：人由你选，事由你管，一切按国际惯例办，不要搞官僚主义的做法。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荣毅仁领衔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10月正式成立，并很快就同世界各国建立起业务往来，逐步发展成拥有上百亿元资产，200多个企业，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大公司，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荣毅仁的带动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鼓舞下，一大批原工商业者都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四化大业出力，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

二是倡导兴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原是对一些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为打破封建壁垒，开拓市场，促进对外贸易而设立的一些特殊区域的统称。它的兴起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500多个不同形式、不同名称的特区遍布于世界各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对这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在财政上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办法，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搞试点。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4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起窗口的作用。经过几年努力，特区的发展十分迅速，到1986年4个特区共开发建设用地60平方公里，有1200多家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开工投产，工业产值达75亿元，1987年达112亿元。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二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的特区后决定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但这些地方不叫特区，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3月底4月初，中

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形成了会议纪要。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同意提出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增强对外开放的活力。这14个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市等。在这些城市中，扩大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放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对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可以划出一定的区域为对外的新技术开发区。这些政策的采取，使这14个沿海城市在引进外资和技术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三步决策。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座谈会，决定这3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包括城市和农村一起对外开放。这3个地区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洲”之称。但在封闭的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为加速发展，中央决定把政策进一步放宽，把经济搞活，使这3个地区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要求这3个地区建立内外结合，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增加创汇能力；努力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创新，推动全国科技的进步；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学习国外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经验，创造适合我国情况的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时，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形成了4个开放特区、14个开放城市、1个海南省、2个三角洲、1个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亿多人口的沿海地带。这个多层次的、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开放政策的一个巨大成绩。它不仅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带动和影响了内地的开发工作迅速进行。

3. 全方位、大开放格局的形成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他的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部署贯彻落实邓小平的谈话精神。接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决定。同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提出，90年代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明确了90年代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再次出现高潮，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地省会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

一是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扩大。1992年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全部开放。目前我国已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的市县已超过900个。

二是明确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下个世纪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三是拓宽利用外资形式。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更多地吸收外资。利用外资的领域，经过试点，逐步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允许经批准的若干城市试办外资银行和保险业。

四是实行地区倾斜政策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的方针，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国家批准的重大投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不分地区都可以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优惠。

五是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这些地区按照外向型经济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档次和水平。广东明确了追赶“四小龙”的战略目标。

1992 年外商来华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情，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一年超过前十三年。1993 年全国新批准外资项目 8.3 万个，协议外资金额 1114 亿多美元，实际投入 275 亿美元，又分别比 1992 年增加 70.6%、91.7% 和 150%。

1993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又进一步上升到世界第 11 位。中国的进出口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5% 以上，成为世界上开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到 1993 年底，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累计注册已突破 17 万户，累计投资总额 3824 亿美元，注册资本 2465 亿美元，其中外方 1502 亿美元。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总量已达发展中国家总量的 40%，来华投资办企业的客商分别来自 146 个国家和地区。1993 年一年吸引的外资数额就相当于前 14 年的总和。该年度中国已跃为利用外资的第二大国。而我国在海外开办的企业也已达 4400 家，中方投资 51.6 亿美元、遍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三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已投产、开业的 8 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1993 年实现工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实现利税 205.8 亿元。1993 年“三资”企业进出口额已占全国进出口额的 34.4%，达到 670.7 亿美元。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三资”企业在汽车、电子、彩色显像管、电梯、程控交换机、光纤光缆、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成为骨干企业。我国还利用外资大大加快了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在“三资”企业工作的中方人员已达 2000 多万人。

1994 年初，我国数项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其中一项就是汇率并轨，一步到位。同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法》。我国 1989 年即提出申请，要求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这部法的颁布则表明我国诚心诚意按照通行的做法管理经济，决心按照国际普遍接受的贸易原则，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

三、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同时也要看到“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可见，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使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得快一些。实践证明，在这十几年的开放中，我国经济发展比封闭的年代要快得多。当然，外资的资本家还是资本家，他来的目的是要赚钱的。因此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必须在利和弊的权衡中，择其利，抑其弊，使国内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至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到那时，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因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是对立的两种政策。这不仅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而且也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甚至被明清以来的历史所证明。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政策，而后者是行不通的。现在任何国家要发展起来，闭关自守都是不行的。什么事情都必须从头做起就太慢了。中国吃过这些苦

头，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闭关自守，

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与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有来往，而以后又关起门来，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当前的世界潮流，已是开放的时代。如果怕资本主义，再来个闭关自守，那么，50年中我国要接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长期坚持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要坚持原则，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是邓小平再三强调的。对外开放的原则有哪些呢？

第一，对外开放要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历史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没有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正是要改变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十二大以来》，1版，中册，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67页~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那些已经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是去坚持过去那种僵化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也不是说社会主义不行了，要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帮助我们繁荣昌盛。我们一旦放弃社会主义，只能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第二，对外开放要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结合起来。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自己，必须维护自己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密不可分。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也是不完全的、不巩固的。尤其是中国更应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因为中国是一个又大又穷、又大又小的国家，要解决中国这样一个有 12 亿人口国家的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把发展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是危险的，是不现实的。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将主动打开国门，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广交天下客，积极争取外援，吸收、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第三，对外开放要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难免会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有些人对西方各种思潮不加分析鉴别，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这种情况不加以重视，对外开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放任资本主义各种丑恶和颓废的东西在中国流行。在对外开放中要特别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上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在文化交流方面既要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又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搞好社会风尚；要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扫除各种丑恶现象，要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第九章 “科教兴国” 战略思想的萌芽

一、魔鞭降临“臭老九”

新中国建立后，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科学技术工作体系，拥有了人数众多的科技队伍，在核技术、航天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切表现出我国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教育发展成为人民普遍享有的基本权利，教育基础大大增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了庞大的教师队伍，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但是，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愈益强化，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滞、干扰和破坏。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受到极大削弱和败坏，“文革”前17年的科技工作成就被一笔抹杀，科技战线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大批的科研机构被拆散，科技设备和实验基地被闲置、破坏，科技资料被毁弃，正常的工作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科技工作近于瘫痪状态。

教育工作遭受的摧残更为严重。1971年出笼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包括广大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文革”前17年的教育工作。

不知依据什么，“革命派”们还对他们认为应该打倒的人们排列了座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名列老九，并被恶狠狠地冠以了“臭”字，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解心头之恨。

于是，多年在科教园地里辛勤耕耘的专家、教授，被迫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事业。有的下到工厂、农村，从事扫地、养猪、拉粪等苦活、脏活；有的进了监狱；有的甚至不堪凌辱，含恨自尽……

于是，全国有很多科研机构和各级学校陷入了瘫痪、半瘫痪状态。

于是，根据毛泽东“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顺理成章地指出了一条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道路：

教育要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相结合，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

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

要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

要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

要推广厂办工人大学、农村的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

要彻底改革教材；

此前，学生早已有过了停课闹革命的经历；此后，交白卷、反潮流更是蔚然成风。在这一片混乱的年月里，“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的口号席卷了中国城乡每个角落。

不过，共和国由此得到的报复也是血淋淋的：据相当乐观的估计，到1977年时，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这年，美国有科技人员120万，苏联90万，中国只有20多万，其中还包括老弱病

残,真正顶用的不多。更为残酷的是,这 20 年的差距及由此造成的各种损失,几乎可以肯定不能在 20 年内弥补起来。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在中国折腾的年代里,毗邻的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就足够了。

二、科教战线整顿中的思想光焰

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就曾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气概，亲自抓了当时处于半瘫痪、半取消状态的科研机构的整顿工作。这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并派胡耀邦等人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

9月，胡耀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纲》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大部分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建议尽快落实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纲》还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9月26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提纲》，并进一步指出：

“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嘛，科研不走在前面？我们在大寨会上说农业拖工业的后腿，科研是拖整个的后腿。”

科技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专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还有点成绩。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

“‘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一些被迫改行的老科学家，“应当发挥作用”。“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思想整顿，关键是班子。”“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提当所长？”“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就工业整顿问题提出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小企业都应当独立或合作建立科研机构，解决一些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发挥他们的技能，“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令人痛惜的是，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送到毛泽东那里后，遭到了否定。

虽然如此，邓小平的认识丝毫没有从《提纲》的立场上后退。典型的例子是，当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后，邓小平没有哼哼哈哈地予以迎合，更没有痛心疾首地自我否定，而是引经据典他说马克思这样讲过。于是，毛泽东无话可说了。如果看看1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就此作的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种坚定性和一致性就表现得更加明白了。他对胡萨克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2.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邓小平在听取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时还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要注意调动几百万教师的积极性，”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学校应“以学为主”，“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教育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它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教育培养不出高质量的人才，科技就出不了高水平的成果；教育不能源源不断地向科技战线输送人才，科技研究的领域就难以拓展，整个科技队伍就会后继乏人。从更长远和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教育的发展涉及到整个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教育的发达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如果教育不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会拖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危机。邓小平关于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水平的论述，把教育与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连在一起，与社会主义的前程连在一起，在举国上下仍弥漫着“读书无用”之风的情况下，极大地提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去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

三、“科教兴国”战略的奠基石

1. 复职前夕的思索

虽然邓小平对科技、教育及其它战线的整顿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被迫在1975年11月中断了，但是，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可能不忍再看到中国这样无休止地动荡下去，因此大大缩短了波折的期限。

经过这一波折，邓小平对大力整顿和发展科技、教育的迫切性有了较前更为深刻的认识。

1977年5月24日，尚未正式复职的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除了大胆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外，还特意就科技和教育工作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

“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于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

“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判断，邓小平是怎样在那曲折的岁月里思索出这些真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0页~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0页~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知的见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见解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与时代脉搏的跳动完全一致的。因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首要因素。大家都认识到，未来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将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谁能在这一方面拥有压倒优势，谁就将执未来世界之牛耳。

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探索整整耗时20年，却未能对同时代境外发生的这一巨变作出应有的反应，他更关注的是战争对祖国的威胁，以及他力之奋斗一辈子的革命。直到他逝世之后，才由他手下那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里确立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王位。

2. 树人大业，立国之本 1977年8月4日，一次对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小型会议——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再次复职不到半个月的邓小平来到会场。他对与会的30多位著名专家和教授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

教育事业要发展，首先要进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在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后，邓小平于8月8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当时教育战线普遍关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工作的主导方面是红线。这期间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重申无论从事科研的，还是从事教育的，都是劳动者，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并强调就目前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邓小平指出，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树立好的学风。他特别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认为这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他还提出后勤工作要为科研和教育工作服务，要给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

但是，由于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积重难返，更由于教育部门负责人心有余悸，致使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举步维艰，进展不大。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专门找当时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果断作风鲜明地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强调指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10年8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有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

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抓住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症结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此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在教育部门的努力下，按照邓小平讲话

的思路，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迅速展开。

推翻“两个估计”，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的讲话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座谈会，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和产生的恶果，否定了“两个估计”。1979年3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的有关报告，正式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从而砸碎了“文化大革命”套在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发生的诸如张铁生“白卷事件”、河南“马振扶事件”以及“一个小学生日记”等问题，为因此类事件而遭受迫害和受到牵连的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党的有关政策，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恢复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各级学校中的工宣队员和军队支“左”人员，一律撤离学校；学校过去行之有效，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废弛的管理制度逐步恢复。1978年2月，教育部发出《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使基础教育逐步走上正轨。高等院校在教学内容、学习秩序、教师职称工作等方面也开始走向正常；确立恢复并增加了一批重点高校，学位制度也于80年代初恢复。学校教育、学习风气有了根本好转。

在这方面，影响较大、反映强烈的是高校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考试招取新生的做法。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办法，受到广大青年和社会的普遍欢迎。是年底，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全国高校从中录取新生27.3万名。随后，高校还与科学院系统一起恢复了招取研究生的制度。这些制度的恢复实行，不仅提高了高等学校的学生质量，而且对于提高中小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全国的教育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根据实际需要，恢复和发展了两条腿走路和多种形式办学的做法，整个社会教育出现了新局面。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逐步对中等学校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的方针，并建立了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制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些都给广大社会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激发了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学习知识的热情，对于完善我国的教育体制，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发挥着良好作用。

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使一度萎缩的中国教育事业迅速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到1981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学生达到128万人，比1976年翻了一番。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招收的研究生相当于“文革”前17年招生总数的1.7倍，并培养出了一批硕士、博士，全国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国际教育学术交流有较大发展，到1982年，国家向国外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2万人，接受外国来华学生4000多人。历经坎坷的中国教育事业真正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教育同政治、经济关系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教育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教育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地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邓小平对教育价值观的科学提升，也是我党对教育价值功能在认识上的又一大

突破。

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此后，他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密切注视着科学技术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新变化，注视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科学技术的新要求。1986 年 10 月，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根据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二大”把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又将科学技术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了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的经济发展战略。

正是通过对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本质的分析，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变革作用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1988 年 9 月 5 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月 12 日，他在听取一次汇报时又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2 年初，他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决不单纯是词语上的变化，而是理论上的飞跃。这一意义重大的科学命题，深刻反映了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运动的根本特征。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曾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这就表明，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科学与技术、生产正在迅速一体化，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带头因素和动力基础，成为社会生产中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凝结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1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377 页~3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8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二，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日益缩短。据统计，在 40 年代，这一周期为 50 年，50 年代为 40 年，60 年代为 20 年，70 年代为 10 年，进入 80 年代以来则越来越短，如今一旦在实验室取得成果，一二年内就有可能实现产业化。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第三，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统计资料显示，科学技术因素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本世纪初只有 5%~20%，当时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今天在一些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因素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一半，达到 60%~80%。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大大提高了工具机以及整个生产流通过程的工作效率。其次，表现在它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巨型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工业设计的方法。据科学家计算，计算机辅助设计，可降低土木工程成本 15%~30%，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时间可缩短 30%~60%，废品率可降低 80%~90%，设计利用率可提高 2 倍~3 倍。最后，还表现在它使劳动对象系统不断发生革命，这主要是高科技使合成材料日益丰富多样。到本世纪 80 年代，世界合成染料占全部染料的 99%，合成药品占全部药品的 75%，合成橡胶占全部橡胶的 70%。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材料、电子计算机配套关键材料、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能源新材料、超导材料及各种复合材料层出不穷。高新科学技术，还使陆上和海上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的资源得以开发。

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四，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体现，是提高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大因素。

70 年代末，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相继进入高科技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谁拥有高科技，谁就将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影响其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成败的重大因素。高科技竞争，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的竞争。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战略目光，深刻地认识到发展高科技的极端重要性和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1975 年

科技、教育战线上的整顿，不仅为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做了大量工作，还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思想；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8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1 版，158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提出了科研工作要走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些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应该看到，7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以教育、科技和经济发展力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技、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否定，而且孕育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教育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在科技教育等备条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深化改革。经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其中心思想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可以这样讲，中国共产党“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和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邓小平1975年领导科技教育战线整顿的实践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教兴国”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奠基石。

第十章历史的新篇章

一、吹响新长征的号角

1978年底，中国经过2年徘徊，终于拉开了新时期的大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是结束这2年的过渡、开始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开场锣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极大的破坏。

要想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必须端正思想路线，邓小平对思想路线问题曾做过深刻的阐述。他说：“一个党，一个国，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才能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才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发展，同时，又指出解放思想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前提条件，只有解放思想，解决思想僵化问题，才能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号召全党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指导方针。这是一场关于思想路线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这是全会的重大功绩之一。由于三中全会按照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首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才能使我们党从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焕发党的蓬勃生机。也正是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全党全民从长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2.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的概括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根本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而且抛弃了粉碎“四人帮”后的2年中还在延续的一些错误口号，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政治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这条政治路线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党的八大路线：（1）它不仅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而且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把“八大”只注意解决生产力落后的思想向前发展了。（2）它对于阶级斗争的内容、范围、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从而防止了阶级斗争对现代化建设的干扰。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为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社会主义经济顺利

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并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保证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

3. 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实行按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表现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急于求成，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一再失调。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当时的经济情况，提出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要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全党集中主要精力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这些正确主张是经济工作中带根本性质的拨乱反正。

4. 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指出，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法制很不健全，结果我们吃了大亏，这主要是我们过去对法制工作重视不够，总认为只要思想作风对头，政策对头，法制工作放松一点也可以。我们中国进行革命，长期住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法律、法规历来比较少，那时主要靠政策，靠大家思想一致。建国后，制定了宪法，但很不健全。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不要任何证据，就可以把人抓起来，或者捏造罪证，随便抄家，随便进行打、砸、抢。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三中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忠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表现在5个方面：（1）在中央组织机构方面作了重要的调整和加强；（2）结束了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3）强调要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端正党风；（4）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残酷斗争；（5）宣布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以上几方面标志着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恢复，并为进一步解决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全会加强了党的领导机构，决定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其实质内容在于：它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恢复和发展了党在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解决了过去长时期没能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开始结束多年来“左”倾错误严重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使党的事业全面地转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轨道，同时，又决定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引上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征途。

二、凸现鲜明主题

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4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拨乱反正，当然改革开放也已迈开重要步伐。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979年3月底，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指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如人口多的问题，这同现代化的生产只需很少的人是矛盾的。这就要统筹兼顾，否则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按一个模式。他说，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

1980年初开始，到1981年夏，我们党集中进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总结。其中特别着重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讨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经过建国32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系统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我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且总结了这条正确道路的基本点，即：

- 1.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 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 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对此，我们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而且要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法制手段予以解决。

- 5.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版，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 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7. 改善和发展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
8. 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9. 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0.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总结，已经接近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基本上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起步中，这个理论开始产生，到中共十二大形成和提出了一个集中的口号，即后来成为这个理论的名称和主题的口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总设计师的理论架构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经济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扩展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经济特区，推进了特区建设和对外开放。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又由经济体制改革进到加速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与此同时，通过“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取得实际进展。邓小平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展开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丰富的理论内涵。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一新的起点。赵紫阳代表党中央向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集中全党的智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更为系统的总结概括。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党的十三大报告概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一共列举了12个方面的理论观点，并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这12个方面的理论观点包括：

- (1)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 (2)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
- (3)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
- (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
- (5)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
- (6) 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
- (7)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
- (8)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
- (9) 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
- (10)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

(11) 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

(12) 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

继党的十三大总结表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之后，党中央及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不同角度又作过几次表述。例如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党建等方面作过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又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概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论述，都为进一步探索这一理论的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胜利的旗帜，前进的指南

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以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力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一，是因为这个理论经受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变局的严峻考验，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这 5 年，国内国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事变的严重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未曾面临过的。它们的发生也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正是这种严峻考验，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巨大的风波和变局中闯过关来，站住脚跟，并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理论作指导，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和威力，人们增强了坚持这个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二，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把这个理论提到了新的高度。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思想观点，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对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

视察南方重要谈话除了重申并强调了许多重要理论原则外，其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贡献，主要有下列各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所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说这个理论走向成熟，第三，是因为以南方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提法，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历次论述的精神，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里面的“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成熟性，“初步”则是说的成熟程度，说的走向成熟。十四大报告对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具有下列特点：

首先，着重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的理论高度来论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未列入其中，这样层次高一些、理论性强一些。

其次，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着重反映了我们党和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新认识，特别是反映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新观点、新思想。

再次，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时代背景、社会基础、历史经验和理论渊源，还阐明这个理论是邓小平的个人贡献和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理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的著作和谈话以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决议等中央文献之中。

再再次，党的十四大的概括是从中国实际来谈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讲的是个性，是中国特色。当然也联系到从《共产党宣言》以来的历史和当前国际的剧变来思考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个性中包含共性。但是，我们是用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不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

最后，说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这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也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越来越丰富了。

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伟大旗帜下进行的。

第十一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1. 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我们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的两位巨人。他们分别领导了中国的两次革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第一次革命。他们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取得了革命的辉煌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了近代中国人民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在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第二次革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开始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领导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了未来社会主义中国的广阔道路和光辉前景。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恢复和确认马列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原则，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带领全党克服了“两个凡是”的影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就从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从思想路线的角度，体现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始人已经提出但不够完善的理论，加以充实和深化。毛泽东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有些思想还不成熟、还不完备。邓小平对这些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深化，如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健全民主和法制等等。第三，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邓小平在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实现了理论突破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符合实际的新理论。这是理论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邓小平理论创新主要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等。

中国是一个拥有 5000 多万党员，12 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没有一个切合国情、紧扣时代脉搏的科学理论作指导，统一党心、统一民心，那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

突破陈规，顺天应时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和人民提供了行动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的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党的十四大还提出了一项跨世纪的战略任务，即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正是由于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后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正如江泽民所说：“只要我们按照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道路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干下去，一直干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一定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 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作过科学预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后，在继承马克思、列宁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却走入了误区。长时期内，我们往往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结果，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引导我们走出这一认识误区的是邓小平。

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就进行了深刻的思考。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1986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90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反复深入思考的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完整的、科学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这一理论的提出，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一，新概括突出地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因素突出出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升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理解，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衡量一切做法优劣取舍的主要标尺，纠正了

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时代和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

其二，新概括为我们坚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指明了方向。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导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因此，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其三，新概括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简单明了的论断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不敢借用的禁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扫清了道路。

3. 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论述，不止一次地提出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对社会主义长期性认识不足等各种原因，在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超越阶段的错误屡见不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曾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发达和不发达两个阶段。但是由于他把工作重点放到了阶级斗争上，所以也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着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论的认识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飞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成熟和不完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这样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人民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走向比较富裕的阶段；是中国由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化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不可逾越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而生产力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要从初级阶段向更高级的阶段过渡，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却需要一个过程。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大部经历了二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发展快的日本也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底子薄、人口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奋斗，这个过程从5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算起、至少需要上百年。这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制定正确路线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一理论的提出，增强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的健康发展，在确定根本任务、战略布局、发展目标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时，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要求的那样，“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力戒重犯“左”和右的错误。

4.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长期以来，一提起市场经济，人们往往把它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这与传统的具有偏颇认识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密切相关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与之相联系，毛泽东也自始至终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只能是有计划，按比例。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两个顽固的教条主义公式，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连西方国家一些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在东欧、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有人极力鼓吹用市场经济来推翻社会主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偏见。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符合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的禁锢，人们不敢从根本上触动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作某种修补或进行某些调整。如果不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改革开放的大业就会遇到严重阻碍。

对这只改革开放的拦路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举起了利剑。早在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旗帜鲜明地指出，说市场经济，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经验不断丰富，通过对东西方普遍规律的了解，邓小平通过分析、比较、思考，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在1992年又作出了更为科学和完整的论断，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的提出，如石破天惊，有力地冲击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经济观念，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解，标志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它表明，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新的时期已经开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党的十四大正式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即经济活动市场化、市场竞争公开化、经济主体独立化、宏观调控间接化之外，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其他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三是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优势。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前进过程中，我们肯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指导，依靠全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开辟美好的未来。

二、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特色

1.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邓小平理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扎根国情，是在中华大地上逐渐孕育成长起来的，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不同民族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如理想、情感、习惯、道德风尚等），这就给理论带来了民族的、地域的、国别的特色。邓小平理论因为生长在中华沃土上，吸收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再加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传统，始终致力于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以邓小平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这一理论既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大道，又完全是中国化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宛如一粒种子，它只有和具体国家的实践土壤结合起来，才能生根、开花、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实践。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邓小平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强调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本国的实际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原理。“社会主义”在这里是矛盾的普遍性，就是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中国特色”相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在这里是特殊生，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我们自己的特殊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邓小平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理论的鲜明民族性，还体现在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之中。例如，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实行“一国两制”等等。所有这些重大决策，由于都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所以在实践中证明了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它们会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2. 源自实践，指导实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对亿万人民群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也是指引亿万群众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因此，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因此，邓小平历来重视实践，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早在50年代，针对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一味高唱美好理想和“革命道理”的现象，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同上，229页。

他就指出：“不管黄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这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曾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恶毒攻击，但他也因这种注重实践的“猫论”而著称。粉碎“四人帮”后，针对党内存在的“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邓小平首先起来进行批判，他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碎了教条主义的枷锁，恢复和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项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而，只能从实践中去探寻前进的道路。邓小平指出，要“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于边总结经验。新时期的改革首先在农村铺开，当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把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并由此形成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思路。

邓小平尊重实践不仅表现在他坚持理论源于实践，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表现在他把尊重实践与解放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事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是找下列答案的。我们只有在实践中摸索。而这一摸索的过程是曲折和艰辛的，中国不发生挫折，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指出：“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因此，他反复勉励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闯，敢“冒”，敢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和提高。对于那些一味停留在抽象的、空洞的争论上而不付诸实践的行为，他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于。”他认为一件事情该不该做，做的对错，都应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事前用教条和本本来衡量。正因为有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勇气和大胆的实践，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也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才实现第二次飞跃，形成邓小平理论。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和丰富源泉，邓小平理论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综合、提炼和升华。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本身并不是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指导实践，满足实践的需要。邓小平从事理论创造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不是一个专业理论家，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战略家。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不是残酷的战斗，就是繁忙的建设。作为职业政治家，决定了邓小平个人决不是抱着要创立一种什么思想体系的念头来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同时他也不可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沉静思索、系统研究，撰写大部头理论著作。火热的现代化建设碰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许多新困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来分析解决问题和困难，需要利用逻辑思维和理论头脑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正是基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才从事理论创造的。纵观邓小平的著作、我们发现，在邓小平思想理论中虽有长篇幅的专题性的理论阐述，但更多的则是回答和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想指导和工作指导意见，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也就是实践性。正由于这一点，使邓小平理论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了空前伟大、突出的效果。

3.时刻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的愿望出发，一切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因此，鲜明的人民性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特色。

邓小平热爱人民，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邓小平在为英文版《邓小平文选》写的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三卷《邓小平文选》中，“人民”这个词整整出现了1171次，使用频率之高，使用次数之多，深刻地体现了邓小平的人民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的体现。邓小平在构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他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由于错误和失误造成的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严重状况，邓小平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初步成效，农民得到实惠时，邓小平就大力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并在全国推广，从而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迅速开展。邓小平坚信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因此必然会向前发展。他指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邓小平还把共同富裕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之一，体现了他“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思想。正如江泽民所说，邓小平“一直关心着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发展前途。”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谦逊对卜实的美德，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心是和人民息息相通的。他把一切功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反对对领袖人物的崇拜性活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表现了他大公无私的宽阔胸襟。

邓小平尊重人民、热爱人民，自然也赢得了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一句朴朴实实、简简单单的“小平你好”，力重千钧，它凝结了亿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无限深情。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页~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江泽民：1992年4月1日对日本记者的谈话。

邓小平理论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自然也受到人民的喜爱。人民群众把邓小平理论奉为行动的指南，从中寻找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不断前进的动力。鲜明的人民性将永葆邓小平理论的生机和活力。

4. 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唯书、不唯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显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特点。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里的“第一次”，指的就是这一理论的创造性。“第一次”即意味着言前人所未言，意味着从荆棘遍地中开辟出新路，意味着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

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表现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敢于反对教条，敢于冲破“禁区”。创造，意味着独立思考，独立探索，要创造，就不能墨守成规，就要冲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就要有开辟新道路的勇气。在“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后，面对党内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的状况，邓小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不迷信教条，不拘泥于本本，不照搬别国模式。他多次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过去我们往往是固守着“老祖宗”说过的话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思想理论上脱离实际，僵化保守，缺乏创造性，以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长期没有新的发展。邓小平与之相反，他要打破这种状况，他不仅倡导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而且身先士卒，自己首先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打破教条的束缚，敢于闯“禁区”。这突出表现在他敢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理论观点，发展毛泽东思想上。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不是教条，其真理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去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错误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落后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准备早打大打的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理论等等。

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还表现在，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实践，而敢于说“新话”，做出新论断上。斯大林曾经说过：“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那么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在于他善于抓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并从这一实质出发，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勇于探索，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多次提醒全党：“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顺利前进。”“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等，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5. 揽时代风云，谋时代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反映了时代的本质，顺应了时代潮流，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因此，时代性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又一鲜明特色。

首先，邓小平理论反映了时代的本质。正确地认识时代是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前提。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将国家引入歧途。邓小平高瞻远瞩，对世界潮流的走向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崭新概括，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真正主题，扬弃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论。邓小平认为，过去长期信奉的“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險迫在眉睫”等观点必须改变。邓小平依据对国际局势的科学观察明确指出：“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他认为，世界大战在一个长时期是打不起来的，尽管世界并不平静，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政治的威胁仍然存在，国际的竞争尤其经济的竞争仍然激烈，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个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时代的本质特征。在东欧、苏联发生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之后，世界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是否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呢？对此，邓小平适时地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告诫人民：“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当今的时代本质丝毫没有变化。

其次，邓小平理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本质，也是当今时代的潮流。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在崭新的世界形势下，能否尽快发展，是以经济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赛。不发展或发展不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就难以稳操胜券；不发展或发展不快，经济落后就会受制于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否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一定要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抓住机遇，把握好时机。邓小平指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3卷，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出：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而当今时代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一方面，国际环境和新的技术革命的形势既使我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又使我们面临着很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进入 90 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但时代主题并未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邓小平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后，又进一步增强了紧迫感，他指出，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谆谆地嘱咐我们：“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应当紧紧抓住难得的时机，加快发展。我们搞改革开放，目的就是为赶上时代，一改中国在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压迫、受奴役。受侮辱的卑下地位，我们要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奋斗，到下世纪中叶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以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邓小平理论破解了时代难题，满足了时代需要。邓小平理论适应时代需要，回答和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和新任务。首先，它科学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课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政权之后，在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处在困惑和困难的境地。邓小平理论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课题。其次，它切实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调整、改革，实现了体制的更新，显示出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实现体制更新，就难以同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的竞争。邓小平在探索的基础上，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里，通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37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24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三、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

1，推进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

要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完成党的战略任务，就必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其一，只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凝聚人心。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党对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共识，因而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达到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实现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凝聚起党心、民心，调动千军万马，共同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努力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因此，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其二，只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才能不断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断克服前进中遇到的新困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许多问题我们还了解、不熟悉，前进中肯定要遇到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困难。另外，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只有如此，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江泽民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多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我们坚信，用邓小平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踏平一切坎坷，走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2.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十四大决定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就是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必将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邓小平理论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首先，邓小平理论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党的领导地位、作用，指明了党的建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能否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所以，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键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说：“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任，加强党的建设更具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探》，1版，3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7期，中央党校，《论坛》杂志社，1994。

极其重要的意义，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既是无产阶级政党本身的性质、特点、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荣历史使命。它与其他政党的不同点在于：其他政党都以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为根本目的，政权一旦到手，大功就算告成；而共产党不仅要取得政权，还要利用政权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建立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要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党组织的自身建设起着关键作用。换言之，完成这个伟大目标，需要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党的领导。邓小平多次强调抓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即：“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其次，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情况下，邓小平更加强调整要对共产党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在组织建设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要按照四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邓小平非常注意党的作风建设，他提醒全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他多次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在南方谈话中，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总之，邓小平理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现阶段，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在服从和服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就能够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新的历史任务。

3.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因此，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对于提高全党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既具有全局意义，又具有深远意义。

理论上坚定，才会有行动上的坚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但关键是要学好邓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学习好邓小平理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能担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重任的。江泽民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越忙，越要带头坚持学习。要带着现实问题学理论，用理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努力在全党造成浓厚的学习理论的氛围，造成浓厚的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氛围。我们还需要用邓小平理论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使他们真正认识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重要的是要做到：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要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对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必须看到，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我们抓阶级斗争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天下的事情纷繁复杂，风云变幻。我们要坚持邓小平强调的原则，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解决问题。不能因解决问题而影响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动摇。第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和右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偏离，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们要努力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富裕幸福。

只要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奋发努力，埋头苦干，到 21 世纪中叶，我们就必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振兴。

第十二章历史的启示

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充分表明：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基点。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做的序言中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来源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

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邓小平下决心抓整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当邓小平在人民的拥护下再一次出来工作时，他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呢？他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作了一个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忧疑，没有采取“做官”的态度，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四届人大召开以后，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绝下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反击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当时，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

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接了当地说：“有的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9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1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毛泽东不断听到“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的汇报，偏听偏信，态度逐渐发生下变化。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

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导致了对他的批判步步升级。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努力被中断。但是，历史已经告诉国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邓小平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社会安邦治国之路。邓小平坚信自己的选择。

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透彻地表述了这一认识：“‘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抓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心系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大局，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富裕，这就是邓小平又一次身处逆境时的胸怀。

二、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注重实践，讲求实效，这种务实作风是邓小平思想理论、思想方法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是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这个原则的，从他个人的曲折经历来说，他“三起三落”就反映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并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结果遭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的打击，开展了对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错误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下，又受到重用，直到建国后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春天恢复在中央的工作后，由于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6年4月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1977年7月重新恢复工作。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在受到错误处理之后，总是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因而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

1977年4月，邓小平在没有恢复工作之时，就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5月，他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对“两个凡是”的批评，破除了个人迷信，为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思想准备。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5月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论断，本来是个哲学常识问题，这场讨论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同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因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哲学理论上根本破除“两个凡是”。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开展，为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同样是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1978年12月，邓小平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反对唯上、唯书，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事求是，最根本的就是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他的许多重大理论观点、战略决策，都是从这个根本观点提出来的。所谓“猫论”是如此，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如此，都是实事求是地探求如何使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的规律和途径。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曾经引用并赞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讲过的话，即检验一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大小，就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实在，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即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历史必由之路。

三、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 1975 年全面整顿时期酝酿，到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理论不但包含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 10 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思索，而且包含着对 40 多年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 10 年“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深刻思索，也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70 多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思索，是历史经验的记录、总结和升华，是集体智慧、群众智慧的结晶。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体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首先，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完全地面向群众，为了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来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共产党必须要为人民做两件大事：一是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二是使人民富裕起来，过富裕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这种理论论证了做这两件大事的必然性，以及一系列重大原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特点尤其鲜明。

邓小平在 1969 年到 1972 年这一段时间，在江西南昌市城郊一个小工厂，完全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同工人师傅们共同劳动了 3 年多，这使他充分体验了来自下层的情绪和呼声，使他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更加坚实、更加坚决。所以当他重新恢复领导工作后，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生产受到破坏，反而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按劳分配，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不能容忍。他主张全面整顿，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建国大纲。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设计蓝图，关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关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无不是从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根本宗旨出发的。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剥夺人民群众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是向人民群众的利益进攻。这同样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重视从群众中汲取养料。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群众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讲到这一点时，充分赞扬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不在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1992 年 10 月 31 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首都理论界学习十四大报告座谈会发言摘要》的报道，其中谈到邓小平看了十四大报告草稿后说的一段话：“小平同志还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佑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

劳就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再次，邓小平还以人民群众的情绪，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标尺。邓小平总是强调说，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必定拥护，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针对改革开放的实际，邓小平高兴地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接受；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我们走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总之，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和产生，首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如果过去面对失误和曲折，只是使我们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文革”的灾难则使邓小平认识到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面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制造的混乱，他不得不反复说明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最基本的道理。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要为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打下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总结了1958年~1978年这2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经验以后，深刻地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邓小平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总是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承认自己“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把自己的一切重大的贡献，都归功于党的集体领导，一贯主张不要突出他个人。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人所共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1984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已近800斤，农民的纯收入全国平均每人达到355元，城乡居民的家庭平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已达到608元。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为使改革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于1984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没有把它看成是自己个人的功劳，而看成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他在当年10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邓小平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绩上，首先肯定集体、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他不贪群众、集体之功；在过失上，既有集体的责任，也有他个人一份，他不推托自己的责任。邓小平这种对待功过的科学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和群众路线。

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的全面整顿，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得到了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处于最高地位的毛泽东的支持；1975 年整顿之所以中途夭折，也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发动了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的结果。这一事件很典型地说明，“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当十年动乱终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党和人民终于接受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深刻的教训：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要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要建立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

邓小平率先论及这一重大问题。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当时的状况，强调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并要求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切实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相一致，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此前后，理论界和党内外越来越多的群众也开始探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关理论问题。其中一个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进展，是在民主作为手段与目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民主建设之所以历经坎坷，重要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一种手段”，没有能够认识到民主不仅是手段更重要的也是目的，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理论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中的错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民主被视为手段而畸形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受到批判和压制，而脱离中国国情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所谓“大民主”，却被当作“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而受到肯定和支持，甚至被写进了共和国神圣的宪法。十年动乱中，在这种“大民主”的旗帜下，上自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民主的权利，反而遭到了这种“大民主”的无端侵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根据邓小平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总结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了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党内民主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的设想，并从几个方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1. 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鉴于党内个人崇拜泛滥，家长制作风盛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

《邓小平文选》，2 版，第 2 卷，33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 版，第 6 册，592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名不副实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再三强调，”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为了克服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我们党做了很大的努力。《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作了明确、全面的规定。随后，从党中央一级做起，先后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议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建立和完善了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这些原则的规定和制度的执行，对于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2. 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从50年代后期起，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党内正常的民主渠道被堵塞。长期以来，党内实际上只允许一个声音，不准发表不同意见，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盛行起来的是不负责任、不受制约的“大民主”，说空话、说假话，而下敢说真话。否则，动辄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大帽子，而遭到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直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状况不改变，思想无法解放，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所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对于发扬党内民主，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党内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3. 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之一，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长期以来，我国不仅法律本身不健全，而且更严重的是并没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使宪法和法律的实践受到妨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无法无天。而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章和宪法中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在事实上留下了法治的“空子”，其结果不仅破坏了国家的法治，而且也损害了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党的地位。早在“文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化大革命”前，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曾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每一个党员，不管其功劳和职位如何，都要毫无例外地“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再次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党的十二大和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总结了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分别写进党章和宪法。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都一再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必须领导人民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正确确立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

与此同时，在人民民主方面，邓小平总结了历史上缺乏民主的沉重教训之后，得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是否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民主，不能尊重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就无法真正持久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也必然要不断发展，否则就会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激烈冲突。社会主义要求加强整体协调，在社会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经济社会资源，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整体协调的科学性，避免出现严重失误。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连说真话、实话的权利都不能得到，甚至被迫违心地说假话、空话，人格遭受摧残和扭曲，是根本谈不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人民民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任何忽视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和行为，都会在客观上损害社会主义。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强调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原则的堆积，民主只停留在一般原则上，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生活。民主更主要的是一种制度，而且是具有权威性稳定性的法律化的制度。只有转化为这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硬性规范，民主才能实现。

民主建设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条件的特殊性，我国的民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也不能盲目追求民主形式，而要讲究实效，从现实可能性出发，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建设。在民主建设问题上，也要防止急性病，特别要反对“大民主”的作法，不能搞什么“群众运动”。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同“全盘西化”、“无政府主义”和“急躁冒进情绪”划清了界限，对我们切实加强民主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项内容。要切实推进这些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向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

总而言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在 1975 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讲过“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几个”这样的话。这既是邓小平对自己身上具有敢做敢为，坦率直爽性格的自我表述，也是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意思是他不怕别人抓辫子，扣帽子，不怕再一次被打倒，只要认定自己的主张和实践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这种敢做敢为，直言不讳的性格，与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胸怀坦荡的风格是一致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18 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取得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的中国，必将赢得明天。

